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

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 编写
马列之声 编辑扫描
三叶草革命之声 OCR粗校再版



再版说明

本书原为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所编写，马列之声提供了扫描版PDF。这本书内容可作为同志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斗争历程的学习材料，对于我们识别潜藏的阶级敌人、修正主义、“左”倾右倾分子，开展路线斗争有着很大帮助，故特此再版。

书中正文所有黑体字部分，即为原书中黑体字部分（但因排版问题着重号删除）。对正文无修改，但分段有改动。

由于制作仓促，加之所用OCR的识别率偏低，不免有很多包括错字、漏字在内的许多疏漏，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三叶草革命之声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前 言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来，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战斗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从那时起，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斗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和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十九世纪末，出现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于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更加深广的范围内开展起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同帝国主义

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开创的革命事业，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在实际上解决了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捍卫了列宁主义，巩固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斯大林逝世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妄图步苏修叛徒集团的后尘，在中国实现他“克己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然而，毗蜚撼树谈何易！我们党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继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之后，又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谋。铁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的一时的猖獗，是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垂死挣扎的反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丝毫无损于这一学说的灿烂

光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激烈搏斗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亲自动员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反复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美苏两霸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日子很不好混。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正在进一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正在革命实践和总结经验过程中成长壮大。第三世界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奔腾向前。我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胜利开展。在这个时候，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那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重大路线斗争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又是怎样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怎样战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这些路线斗争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哪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几次重大斗争，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目 录

(4) 前言

(10) 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 (10) 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 (15) 马克思恩格斯为粉碎蒲鲁东主义而斗争

—— (26) 巴黎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33)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 (33) 巴枯宁主义是什么货色？

—— (38)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斗争的初步胜利

—— (43) 马克思恩格斯为彻底粉碎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而斗争；巴枯宁集团的覆灭

(50)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 (50) 拉萨尔主义的出笼

—— (58)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重大胜利——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 (63)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和拉萨尔主义的彻底破产

(75) 四、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 (75)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 (80) 伯恩施坦是怎样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90）列宁是怎样粉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的猖狂进攻的？

（104）五、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105）考茨基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和可鄙地动摇、叛变的典型

———（111）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揭露和批判

———（122）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133）列宁对考茨基“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138）六、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138）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托洛茨基的揭露和批判

———（143）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148）斯大林为捍卫列宁主义彻底粉碎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

（165）七、列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165）布哈林其人

———（171）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路线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83）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覆灭

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斗争的需要，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同当时流行的各种非科学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路线斗争。

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资产阶级

^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影响较大的机会主义头子。他出生在法国柏桑爽城郊一个小生产者的家庭，当过旅馆的雇工、排字工人，与别人合伙开过小印刷所。184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轰动一时，从此便在社会上出了名。蒲鲁东写过不少的书，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1848）、《论革命和教会的公平》（1858）等等，而1846年发表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则是他臭名远扬的代表作。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等著作中，宣扬了一整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和反动的政治观点。他把人类历史说成是观念的历史，是少数英雄创造的，而人民群众不过是观念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他还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超人”的“社会天才”，狂妄地宣称他的著作“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①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从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英雄史观出发，蒲鲁东炮制了一条鼓吹改良、主张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他把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看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把维护小生产私有制作为奋斗纲领，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两者所招致来的东西都是坏的”。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要消灭包括小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这就会使小生产者丧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会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原则。

那末怎么办呢？蒲鲁东杜撰了一个超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即“自由”的社会。他认为，从经济上说，这个社会要“废除私有而保存领有”，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社会。所谓“个人领有”就是小私有，所谓“废除私有而保存领有”，就是企业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政治上说，这个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在那里个人绝对自由，不仅没有任何组织、制度和国而且没有任何权威，即没有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服从”。一句话，他所说的“自由”社会，就是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生产者的社会。蒲鲁东自以为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既批判了资本主义，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根本没有超出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资产阶级的眼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①。

怎样才能建立这种所谓“自由”的社会呢？蒲鲁东认为，组织“交换银行”又叫“人民银行”）是根本的道路和手段。据他说，通过这种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发展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既可挽救因受资本主义竞争和高利贷盘剥而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又可以为无产者购买工具、原料进行独立生产创造条件；同时，还可以通过这种银行组织小生产者进行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不难看出，这付“灵丹妙药”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是根本行不通的。恩格斯针对蒲鲁东派宣扬的用工人储蓄来建立作坊，进而“购买整个法国”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曾经辛辣地嘲讽说，工人口袋里连六个铜子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②按照蒲鲁东的这种美妙的幻想，“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的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③基于这种错误观点，蒲鲁东拼命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极端仇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宣扬“工人罢工是违法的”，疯狂叫嚷“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比实行暴力革命“要好些”他的口号是：

①《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47页。

②③《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页

“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彻底暴露了他企图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痴心妄想。

概括地说，蒲鲁东主义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经济改良的办法，使小生产私有制普遍化，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改造为“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复旧主张，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论，是冒牌的假社会主义学说。它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①

蒲鲁东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它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特别是在法国，曾经风行一时，流毒很广。这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当时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大生产虽有发展，但小农经济与手工业仍占主要地位。例如，直到1866年，在法国巴黎的四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中，属于大企业的还不到五万人，小农仍占全国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竞争经常使小生产者遭到破产，沦为无产者，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不满。但由于阶级地

^①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位的限制，他们又往往不敢面对现实进行斗争，只求通过和平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办法，保住自己的小私有财产，幻想恢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使小生产者永世长存。

蒲鲁东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他的父亲是农民也是木桶匠，曾经打算开设一个木桶作坊，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高利贷的盘而破产，不但作坊没开成，连土地也卖掉了蒲鲁东本人也亲身经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小生产者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所以他成了这个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机会主义谬论集中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

马克思恩格斯为粉碎蒲鲁东主义而斗争

蒲鲁东主义的出笼和泛滥，严重地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粉碎蒲鲁东主义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战斗。

早在1846年，恩格斯就专程来到巴黎，围绕着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同蒲鲁东分子以及旅居巴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尖锐的斗争。他们经常连续几个晚上举行集会，进行论战。在论战中，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着重论证了暴力革命的要性，并对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作了简明扼要的

概括：（1）维护无产者的利益；（2）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3）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能是暴力革命。经过斗争，使当时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在巴黎的大多数成员，都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粉碎蒲鲁东主义，系统地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宣扬的反动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在这部列宁称之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企图以对立的调和来代替对立的斗争、以改良主义的办法“限制”资本主义的谬论时，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揭示了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①

针对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在阶级对抗存在的情况下，“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乔治·桑广）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①

正是在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并在1848年2月，以“同盟”党纲的形式，发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深刻地阐明了：阶级出现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领导力量。

《共产党宣言》还痛斥了资产阶级诽谤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反动谬论，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光辉思想。《共产党宣言》豪迈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共产党人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共产党宣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的这个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号召，成了一百多年来国际无产阶级最响亮的战斗口号。

伟大导师列宁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学说的“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是最好的阐述”^②。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开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指出它的反动本质就是妄图通过点滴的改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以便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诱使无产阶级厌恶一切革命运动，心安理得地接受它的改良主义谬论。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蒲鲁东主义称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法国就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集团统治的反动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接着，革命风暴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即欧洲1848年革命。1848年6月，巴黎又爆发了工人武装起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③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2页。

的第一次搏斗。

蒲鲁东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竭力反对暴力革命，胡说什么“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放心吧，读者，我不是主张抢劫和暴动的人”；另一方面继续兜售他的改良主义方案，亲自动手筹办“人民银行”发行一万二千张股票（每张票面值五法郎），诱骗工人背离革命斗争，充当了资产阶级绞杀革命的可耻帮凶。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就在1849年2月被迫宣布关闭。1848年革命的实践，无情地证明了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荒谬与反动，“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①；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

1848年革命失败后，蒲鲁东更加堕落。1849年4月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而被逮捕并判处三年徒刑，可是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他却在狱中写了一本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指责革命派，向波拿巴献媚。马克思愤怒地指出他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②。此后，蒲鲁东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沿着反革命的道路越滑越远了。

为了及时地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工人运动健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五十年代写

①《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②《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47页。

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沉重地打击了蒲鲁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①。列宁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欧洲1848年革命的实践，又进一步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③，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进程中“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④，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国家，并且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明确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⑤，的科学术语，全面揭示了这个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伴着1857年爆发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打破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沉寂局面，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39页

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

③⑤《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417页。

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1864年9月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以下简称国际）。虽然国际建立不久蒲鲁东就死了（1865年1月），但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直接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方面，因而也就更加烈了。以法国的昂利·路易·托仑（1828-1897）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承袭了蒲鲁东的衣钵，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一再提出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提案，竭力排挤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妄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由他们把持的国际巴黎支部，公然拒绝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歪曲国际章程，鼓吹他们的反动谬论，妄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

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了第一国际前期（1864-1868）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迎头痛击蒲鲁东主义者的猖狂进攻，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就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迫切的战斗任务。

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锋芒都是指向蒲鲁东主义。在这些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两条路线反复斗争的焦点。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规定了第一国际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战斗组织，制定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国际的最终目的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特别强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①，“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②。

而蒲鲁东主义者却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竭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各种反对革命的方案，妄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国际。蒲鲁东主义者硬说，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不存在矛盾；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通过和平改良，而不应该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他们主张“用一种巧妙的、合法的”的”方法“把资本给予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这个所谓“巧妙的、合法的”方法是什么呢？原来还是通过银行贷款，协助工人发展合作社，使工人成为企业主那老一套货色。根据这种观点，他们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把国际变为世界合作协会并在国际之下设立合作商店和交换银行的方案。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136页。

同时，他们竭力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反对组织工会，甚至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和妇女参加生产。

马克思在大会之前就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着重说明了蒲鲁东主义的万能手段——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使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合作劳动制度，“**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①。大会经过激烈辩论，批判了蒲鲁东派的方案和机会主义观点，根据马克思的《指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挫败了蒲鲁东派妄图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罪恶阴谋。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他们依仗拥有多数代表，妄图翻案，继续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公开散布政治斗争与无产阶级无关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者迎头痛击了他们的猖狂反扑。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这就是说，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的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要彻底解放，要在经济上获得翻身，首先必须参加政治斗争，赢得自己的政治权利、政治自由。决议还指出：“每年都要重申这种主张”。蒲鲁东主义者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219页。

（二）关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处于沙皇俄国反动殖民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在1863年举行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赞扬这次起义，并且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他们指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①。当时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反动堡垒，到处推行霸权主义，扼杀革命运动；波兰的独立可以削弱沙皇俄国的力量，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所说的：“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收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②否则，工人运动就会遇到阻碍，遭受失败。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却从民族虚无主义立场出发，公然否定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胡说民族是一种“陈腐的观念”，反对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甚至放肆地吹捧沙皇俄国是“先进的强国”，诅咒波兰起义的被镇压是“罪有应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斥责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动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对待波兰起义的态度，是“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③。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根据马克思的《指示》，通过

①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③ 《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47页。

“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复兴民主的波兰”的决议，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沉重打击了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

（三）关于废除私有制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又一个原则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占有制是私有制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①可见，是否废除私有制，就是坚持还是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伟大目标的问题，它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第一国际的根本方向。

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地坚持小私有制，多次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挑起争论。在洛桑大会上，以托仑为代表的一部分蒲鲁东主义者宣扬个人所有制，说什么“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在布鲁塞尔大会上，他们又狂叫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气焰十分嚣张。马克思为了给蒲鲁东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彻底粉碎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谬论，还在布鲁塞尔大会之前，就专门在国际总委员会上作了报告。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不能保证劳动农民的真正解放，所以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经过激烈争论，布鲁塞尔大会根据马克思的报告，作出了正确的决议，指出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成为社会的必要，国家应将土地、矿山和铁路交给社会共同使用、这个决议对蒲鲁东主义者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标志着整个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破产。布鲁塞尔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学习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这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其他各种假社会主义斗争的辉煌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国际中逐步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由于蒲鲁东主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后，蒲鲁东主义者就分化为左、右两派。

左派如瓦尔兰等人口益接近马克思主义，并且积极参加和领导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右派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死敌。

巴黎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为了击破资产阶级卖国投降、解除工人武装的罪恶阴谋，举行了英勇的起义，并于3月2日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推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公社打破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创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公社的英雄们在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中，表现了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为世世代代的革命人民所敬仰。

马克思、恩格斯热情赞扬、积极支持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们组织了很多国家的工人开展声援公社的活动。马克思还写了许多文章和几百封信，向各国无产者介绍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相，阐述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驳斥资产阶级的谣言和诽谤，同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们还经常研究讨论公社的情况，并过口头传达等途径：对公社的措施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示。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又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及时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高度地评价了巴黎无产阶级创造的丰功伟绩，科学地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等机会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精辟地阐述了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①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②，“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行无产阶级专政”^①提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的名论，解决了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什么样式的国家这个重大问题。正如恩格斯针对机会主义者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时所说的：“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马克思还根据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和阶级斗争的规律，预见到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后，将可能遇到“奴隶主们”的“暴动”和“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④。

巴黎公社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十二天，就被资产阶级反革命匪帮扼杀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当时，在巴黎公社领导成员中占优势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他们都不可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布朗基派虽然主张进行革命，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他们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而是企图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夺取政权建立少数英雄人物的专政。蒲鲁东派则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3、37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416页。

主张绝对的自由和自治，反对集中和专政。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消灭一切国家政权的开始。因此，他们在掌权后，不是乘胜追击逃往凡尔赛的反动政府，彻底镇压反革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忙于向工人发放低息贷款，调整产品交换，妄图推行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蒲鲁东主义左派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虽然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但也没能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犯了不少错误。至于蒲鲁东主义右派，有的（如托仑）已经公开叛变，投靠凡尔赛反动政府，成了绞杀巴黎公社的帮凶；有的（如贝累等人）则在公社内部竭力推销蒲鲁东主义黑货，公开鼓吹“劳资团结”，妄想“建立劳资新协定”。贝累还利用他作为公社派驻法兰西银行代表的身分，拼命反对公社没收法兰西银行，充当了银行资本家的代理人，结果使银行能在巴黎公社期间汇给凡尔赛政府两亿五千七百万法郎，给他们提供了疯狂反扑的资本。

但是，不论布朗基派还是蒲鲁东派的错误，都不能掩盖巴黎公社的灿烂光辉和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公社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冲破了错误理论束缚的结果。列宁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不顾错误的理论为自己开拓着道路。”^①恩格

^① 《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列宁全集》第八卷，第180页

斯也明确指出：“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①

蒲鲁东主义者否定一切国家，反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集中，特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巴黎公社却正是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举，正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府。

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大生产，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而巴黎公社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就是规定要组织大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以每个工厂的工人联合为基础，而且应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巴黎公社采取的一系列其他经济措施，如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等，也是“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

按照蒲鲁东学派信条“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③。总之，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指南。它最终地宣判了蒲鲁东主义的死刑。所以，恩格斯说：“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④，

①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

②③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④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①。

1872年，蒲鲁东的信徒、德国的医学博士米尔柏格又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但那已是一种回光返照了。他针对当时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住宅紧张的情况，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使每个房客变成自己住宅的主人把整个社会变成“独立和自由的房主的总和”。

恩格斯立即在同年发表了《论住宅问题》等著作，对米尔柏格的反动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夺得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占有生产资料，才能真正解决住宅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恩格斯有力地捍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无情地揭穿了米尔柏格之流妄图开历史倒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丑恶嘴脸，进一步从理论上清算了蒲鲁东主义。

恩格斯在1887年讲到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时曾经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有过很大的影响。而现在就不同了。在法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的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在比利时，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工人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甚至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清除了；在罗曼语地区的

^①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代替了。

恩格斯同时深刻地指出，虽然蒲鲁东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中已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仍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后来的机会主义者将会利用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他们“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事实正是这样。蒲鲁东虽然早已完蛋，然而，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张倒退、主张复旧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却一直为形形色色的新、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所承袭和发展。蒲鲁东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今天，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制定自己的反动纲领，不仅承袭了蒲鲁东复旧、倒退的衣钵，而且乞灵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大搞“克己复礼”，梦想把中国拖回到旧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就更加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但是，历史的巨轮岂容倒转。这些在不同时代开倒车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落得个彻底灭亡的同样下场！

① 《〈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3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刚刚被击败，巴枯宁就跳了出来，大搞分裂活动，大耍阴谋诡计，妄图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用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马克思为一国际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的斗争，就成了第一国际后期（1869—1872）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

巴枯宁主义是什么货色？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是继蒲鲁东之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头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搞机会主义、搞分裂主义、搞阴谋诡计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于1814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840年他到林留学，后来辗转于西欧许多城市。1847年，他在巴黎结识了蒲鲁东，受蒲鲁东无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他到处奔走，大搞政治投机。1849年，巴枯宁参加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城市的起义，失败后被捕，1851年被转交给俄国，到1857

年一直被囚禁在监狱中。巴枯宁在狱中曾多次向沙皇写悔过书和忏悔信，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声明要“诅咒我的错误，我的荒唐和我的罪恶”，痛哭流涕地哀求赦免，成了可耻的叛徒。

当1861年沙皇最后一次拒绝赦免他以后，巴枯宁便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经过日本和美国，到了英国。1864年，国际工人会成立不久，巴枯宁在伦敦见到了马克思。他虚伪地表示愿意“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工作”，随后就到意大利去了。巴枯宁到意大利以后，很快就结识了一批失去了小资产阶级地位的青年和许多在社会上盲目浮动的游民。这批人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弄得倾家荡产，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和破坏一切的倾向，对巴枯宁影响很大。正是在意大利生活的几年里，最终地形成了巴枯宁主义。

巴枯宁自称，他的理论是被他“扩大了，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那末，巴枯宁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巴枯宁全部谬论的出发点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他认为，全部历史就是人类由动物性状态向人性状态的演变。而所谓人性状态，则只有在个人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时候，才能实现。巴枯宁宣称，自由是人性的基本条件，一切权力或权威都是对自由的完全否定。因此，反对一切

权力和权威，主张绝对的“自由”和“平等”，就成了巴枯宁全部谬论的基础和核心。

从这种谬论出发，巴枯宁鼓吹“各阶级平等”，反对一切国家。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罪恶根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国家；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的财产都是国家恩赐的，再加上继承权的确立，这些财产就越积越多，从而造成了阶级的不平等。因此，他宣称：“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作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不难看出，巴枯宁的这种胡言乱语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抽掉了国家的阶级内容，抹煞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他披着反对一切国家的外衣，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哪里谈得上真正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否定了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巴枯宁既要保留阶级，又要实现“各阶级平等”，“这种不可客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①，实际上他这种论调，“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另一

^①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0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种说法而已”^①。但是，巴枯宁却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主张，声言只有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

巴枯宁所谓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据他说，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每个人、每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不再有任何权威。“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②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废除”国家、建立“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呢？巴枯宁认为必须过所谓的“社会革命”。他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救世主，把流氓无产者和破产的小生产者当作主要依靠力量，认为流氓无产者是“天生的暴徒”，除此以外的工人群众，都是“无知的大众”他主张通过象他这样的少数“英雄人物”的密谋，掀起自发的暴动来“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首先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举消灭一切国家。他无耻地吹嘘说：“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其实，这里“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③但是，巴枯宁却把空话当成真理，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③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2页。

竭力反对攸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鼓次完全放弃一切政治，拒绝政治运动，要无产阶级相信和等待“社会革命”日子的到来。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如果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参加选举，那就等于承认了国家；如果要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更是违背了他的“废除”一切国家的原则。

总之，巴枯宁这套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①，他的学说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②。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反映了当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打击下和在资产阶级政府压迫下陷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不过蒲鲁东主义是代表了这个阶级中一部分人幻想挽救小私有制的观点，而巴枯宁主义则反映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无法自救的绝望心情。由于巴枯宁主义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它又用貌似革命的极“左”词句把自己的反动实质掩盖起来，所以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欺骗了不少人，特别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刚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在工人中占多数的国家里，曾经广为流传，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危害。

①②《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裂 阴谋集团斗争的初步胜利

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拉山头、结死党、大搞分裂破坏活动方面。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野心家、阴谋家、分裂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机会主义谬论的同时，着重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和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67年秋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②从意大利迁居瑞士。次年混入第一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后，“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③。1868年10月，巴枯宁背着国际，组织了一个阴谋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同盟有自己的纲领，即“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等”；有自己的一整套组织。同盟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团体，在它背后还有隐藏很深的名为“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的秘密组织。“国际兄弟会”由一百名“身有魔胆的人”即亡命之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②③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3页。

徒组成，又叫做“巴枯宁的百名近卫军”，它严格控制着分布在欧洲各国的“民族兄弟会”。第三级才是同盟。总之，这是一个派内有派、层层控制、由巴枯宁直接操纵的阴谋组织。同盟的阴谋活动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力图在保持自己的纲领和派别组织的条件下，混入第一国际，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把国际变成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第二步，如果这个阴谋不能得逞，就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直接搞垮第一国际。

为了掩护他们的罪恶阴谋，巴枯宁在1868年月22日写信给马克思，非常动听地说：“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真是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完全是一幕两面派的自我表演。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已开始觉察到巴枯宁的阴谋和野心。在他们为总委员会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等决议和文件中，明确指出，如果允许在国际内部存在第二个国际性组织，就会使国际陷于瓦解而“**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①只有在同盟废除其错误纲领和解散其组织以后，才能分别接纳它的成员加入国际。巴枯宁为了使同盟混入国际，便大耍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国际提出的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

件，暗地里却把同盟组织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且加紧进行分裂活动和篡权活动。这样，一场激烈的、复杂的路线斗争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在1869年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交锋。巴枯宁一伙企图控制大会，为此，他们在会前就采取各种卑鄙手段，甚至伪造代表资格证件，妄图取得大会代表的多数。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提出了继承权问题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他们把继承权说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认为废除继承权就能消灭财产上的不平等，要求大会宣布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他们提出的继承权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私有制以及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恶毒阴谋在于：如果国际同意这个纲领，那就从根本上篡改了国际的方向和任务，而且可以使人们看到“国际转向了巴枯宁”。这样，他们就可以进一步迫使原有的总委员会成员辞职而由他们取而代之，再将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巴枯宁分子盘踞的日内瓦去，达到完全操纵国际的目的。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没能实现。总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迎头痛击了巴枯宁主义的谬论。《报告》深刻指出，继承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的原因；

恰恰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以后，继承权也就会失去意义而自行消亡。把废除继承权说成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就是要引诱工人离开用革命手段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道路，其结果只能是葬送社会革命。因此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上是反动的”^①。

为了更好地反对宗派分裂活动，大会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吸收和拒绝新的团体或支部加入国际，并且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支部。为什么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的巴枯宁派也“赞成”这项决议呢？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②巴枯宁本想利用这项决议，在篡权后加强自己的权力。但是，代表大会再一次连选了前任的总委员会委员，确定总委员会的驻地仍然在伦敦。巴枯宁的阴谋破产了。

巴枯宁集团妄图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在巴塞尔大会上遭到挫败后，同盟的破坏活动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采取各种卑鄙手段，策划分裂活动，猖狂地向国际进攻。他们公开勾结工联主义（十九世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第285页。

②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8页。

五十一—六十年代在英国职工联合会中出现的、把争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当作唯一目的的机会主义派别）分子、拉萨尔主义分子和残余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肆意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大造分裂主义的反革命舆论。为了回击巴枯宁派的进攻，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写了一个《机密通知》，有力地揭露了巴枯宁的两面派嘴脸和阴谋破坏活动，逐条地驳斥了巴枯宁分子的无耻诽谤，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随后，巴枯宁一伙又改变活动方式，以发展国际组织为名，秘密发展同盟的组织，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1870年月，他们用阴谋手段制造了设在瑞士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分裂，并盗用代表大会的名义另外成立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与忠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相对抗。为了把分裂的罪责推到对方身上，他们首先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出面干预，并且大讲“团结”，妄图迫使日内瓦委员会“统一”在巴枯宁分裂组织下面。马克思起草了总委员会的决议，坚决支持日内瓦委员会，粉碎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勾当。恩格斯后来在谈到巴枯宁派的这种阴谋时，尖锐地指出：“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一语道破了巴枯宁一类骗子两面派的反动本质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

①《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彻底粉碎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而斗争 巴枯宁集团的覆灭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巴枯宁主义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嘴脸。普法战争引起了法国的革命。1870年9月4日巴黎爆发起义，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倒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这同一天，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爆发了起义，赶走了市政官，建立了革命政府。

但是，善于搞政治投机的巴枯宁，这时却跑到里昂，纠合其同伙于9月28日进驻市政厅，攫取了群众的胜利果实，并且颁布了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断送了这次起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最初，一切都顺利。……但是蠢驴们——巴枯宁和克吕泽德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巴枯宁一伙蠢驴。正当他们得意忘形，宣布废除国家的时候，资产阶级国家只派了两连军队就把他们赶跑了。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是，巴枯宁却恶毒诬蔑巴黎公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是“犯罪行为，是蠢事”。这就彻底地撕破了他的“社会革命”的假面具，充分证明了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掀起了一个反对和迫害

①《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1870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73页。

第一国际的狂潮。巴枯宁分子也积极参加了这个反革命的大合唱，趁机加紧分裂活动，妄图利用第一国际的困难处境来篡夺总委员会和地方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

为了回击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挑战和及时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于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召开了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强烈谴责了巴枯宁派分裂、颠覆国际的罪行，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发言，痛斥了巴枯宁的“拒绝一切政治”的谬论。恩格斯刻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人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①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强调指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决定性手段；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②。这是第一次在工人组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它体现了巴黎公社的血的教训，也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重大胜利。会议还针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对国际各级组织

①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②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的名称作了统一的规定，强调禁止一切宗派名称和宗派活动这个决议加强了国际的组织纪律，打击了巴枯宁派分裂国际的阴谋。

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巴枯宁于1871年11月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一个名为代表大会的巴枯宁派分裂小会，东拼西凑才搞到了十六个人出席，据说代表九个支部。他们发出了一个给国际各联合会的所谓通告，公开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恶毒攻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是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是利用“权威”对各地组织实行“专政”和“独裁”；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实行“支部自治”。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疯狂反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总委员会写了一个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一伙反总委员会的阴谋和他们的两面派手法，戳穿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总委员会还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议，派出代表到瑞士进行调查，以便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巴枯宁及其阴谋集团活动情况的报告。巴枯宁对此非常害怕，指使其死党暗杀总委员会代表、国际俄国支部的领导者之一吴亭，妄想杀人灭口。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①但是巴枯宁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调查人虽然受了重伤，仍然按时完成了报告的起草工作。

^①《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自绝于国际。彻底清算巴枯宁的罪行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报告。大会根据恩格斯所作的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决议把巴枯宁及其死党开除出第一国际，并公布巴枯宁派进行分裂活动的罪行，作为向全世界无产者进行教育的反面材料。

海牙大会对巴枯宁阴谋集团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次大会是“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①马克思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斗争经验时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至今仍然是我们战胜一切机会主义者的阴谋诡计的有效办法。

海牙大会并没有完全结束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分子之间的斗争。海牙大会闭幕刚一个星期，巴枯宁派就在瑞士的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他们诋毁海牙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总委员会，宣布建立所谓“反权威主义”的“国际”，实行了公开的分裂。同时，巴枯宁在1873年抛出了他的集无政府主义

①《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②《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观点之大成的代表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最无耻的人身诽谤，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

为了粉碎巴枯宁的垂死挣扎，彻底清算巴枯宁主义并肃清其流毒，海牙大会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从理论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主义的反动本质，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针对巴枯宁拼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①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有力的斗争，巴枯宁原形毕露，在工人运动中陷于彻底孤立。在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巴枯宁于1873年9月在

^①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554页。

《日内瓦报》上登出了一个《声明》，虚伪地宣称自己年老多病，要“退出斗争舞台”，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以便更好地进行幕后指挥。他还疯狂地呼号“让另一些更年青的人去干”他的反革命事业，别有用心地哀叫“只向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请求一件事——忘却”作了最后一次两面派的表演。1876年，巴枯宁死于日内瓦，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不久，他的党徒也发生内讧，落得个树倒猢猻散的下场，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就这样彻底覆灭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巴枯宁，虽然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不仅同时代人，就是现在我們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忘却”。因为“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①。看看巴枯宁这个反面教员的罪恶历史，就能够更好地识破他的徒子徒孙的真面目。在国际上，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无一不是巴枯宁反革命两面派的门徒。当代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更是全盘承袭和发挥了他们这个俄国机会主义老祖宗的反革命手法，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为害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在我们党内，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到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无一不是巴枯宁分裂主义的信奉者。林彪反党集团的丑恶表演，就是巴枯宁分裂阴谋集团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林彪为了推行其“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要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

^①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口头上“高举”、“紧跟”，背地里恶毒攻击；表面上叫嚷“团结协作”，实际上大搞分裂主义。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林彪一伙不择任何手段，使尽了造谣、诬蔑、暗杀等一切卑鄙伎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副披着羊皮的豺狼嘴脸，比巴枯宁更加阴险可耻！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加深理解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主义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激烈斗争。这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次极其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正是在这个斗争中，诞生了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给了机会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我们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

拉萨尔主义的出笼

拉萨尔主义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也是以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为首的反动派竭力破坏工人运动政策的产物。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者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英、法两国，在政治上还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欧洲1848年的革命风暴，对德国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还远没有完成。

到了六十年代初，随着工业革命接近完成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沉静了十多年的工人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工人运动的兴起，迫切需要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迫害，禁止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传播，再加上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加入了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带了进来。因此，当时德国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仍然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对科学共产主义还缺少真正的了解。

这种情况，就使得拉萨尔主义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同时，俾斯麦为了控制工人运动，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正需要在工人运动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这个惯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蛊惑家拉萨尔”，这个“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①干反革命勾当的阴谋家，这个连性格都和俾斯麦相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正是俾斯麦所要收买的合适对象。拉萨尔正是适应了俾斯麦的反革命需要，投机革命，混入了工人运动内部，贩卖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妄图破坏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维护普鲁士王朝的反动统治。

^①《哥达纲领批判》，第56页。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出身在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少年时候的拉萨尔，就逐渐沾染上资产阶级投机取巧、捞取名利的恶习，一心要当“伟人”，要“伸手去取王冠”。

他在柏林大学鬼混了几年以后，就更加目空一切，拼命想挤入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但没有得到赏识，才转而进行政治投机，参加了1848年德国的三月革命，并同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结识了马克思。拉萨尔经常剽窃马克思的著作，加以歪曲，还无耻地自称他是“马克思的忠实的学生”，企图以马克思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却在背后疯狂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拉萨尔竟然以马克思在德国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马克思的指示，开创了拉大旗作虎皮，益用革命导师的名义干反革命活动的先例，充分暴露了拉萨尔这个政治骗子的真面目。

六十年代初，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公开鼓动，力图把工人运动拉向右转。1862年的春天，拉萨尔抛出了他的小册子《工人纲领》，俨然以“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的身份向工人说教，实际上却是剽窃了《共产党宣言》的词句来装饰门面。恩格斯曾经揭露说：“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

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①。

拉萨尔就是用这种鱼目混珠的卑鄙手法，贩卖他的机会主义货色，蒙骗了不少工人群众。当时莱比锡等城市的工人组织要拉萨尔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1863年3月，拉萨尔发表了《公开复信——致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更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

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投靠俾斯麦，出卖工人阶级利益。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叛徒、内奸和工贼。1863年5月11日，即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十多天，拉萨尔就应俾斯麦的邀请，同他密谈。从1863年5月到1864年夏，拉萨尔给俾斯麦写过很多信，找过俾斯麦十几次。在密谈和通信中，拉萨尔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行动计划，统统泄露给俾斯麦，并竭力表白自己对普鲁士王朝的忠心，说什么“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政治”，要死心塌地为斯麦效劳。在拉萨尔同俾斯麦商妥的政治交易中，他向俾斯麦保证，只要普鲁士政府“恩赐”给工人以普选权，工人就决不用武力反对政府，并“以工人的名义”，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统一德意志。

当时，远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勾结密谋的具体内容。但是，他们从拉萨尔无耻吹捧铁血宰相俾斯麦是“明智的政治家”、“他的许多见解同我的理论一致”，以及卖力地支持俾斯麦实

^①《哥达纲领批判》，第57页。

行的内外反动政策的言行中，已经觉察到他同俾斯麦有所勾结，十分警惕拉萨尔的叛卖活动他们尖锐地揭露说：“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①，“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②。后来于1928年从普鲁士内阁的旧档案中，发现了拉萨尔同俾斯麦通信的原件，这是拉萨尔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的铁证。

拉萨尔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的叛卖，当时广大工人群众是不知道真相的。由于拉萨尔在鼓动时，给自己披上种种伪装，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打着“《共产党宣言》拥护者”的旗号，到处发表演说，招摇撞骗，使许多工人群众一时识不破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反而搏得了工人运动“鼓动者和组织者”的美名，造成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③这种情况，就使得拉萨尔窃取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并使这个组织成为推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

拉萨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哲学上，他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狂热信徒。拉萨尔按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创造了客观世界的谬论，把阶级社会的历史看作是“理性”不断发展的结果，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瞧不起年轻的无产阶级。眼里根本没有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露骨地鼓吹英雄创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3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63页。

③《哥达纲领批判》第56页。

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狂妄地要求工人对他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①！他以傲慢的口气对工人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普遍真理，你们就应该完全相信我，我在科学的每个领域内都获得欧洲的普遍承认，有着欧洲的声誉。”过黑格尔把自己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看作是“绝对真理”；拉萨尔则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谬论看作是恩赐给无产阶级的“普遍真理”。

第二、在政治上，拉萨尔鼓吹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观，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企图用争取普选权的议会斗争来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胡说暴力革命的道路是“阴惨的途径”；他主张用“自由的人民国家”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工人一旦获得了直接的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从而导向“全民的统治”、“导至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失”，实现他的“仁爱的口号”。他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工人运动完全看作是“宗派的运动”。他还胡说什么除工人阶级以外，其他所有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把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推向反动阶级。拉萨尔既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也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在拉萨尔主义那里，什么阶级斗争，什么革命，统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最反动的口号：“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此外在德国统一问题上，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4页。

拉萨尔完全赞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意志各邦的反动政策，竭力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统一德意志的正确道路。

第三、在经济上，拉萨尔提出了一整套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则相对抗的谬论，竭力为雇佣劳动制度辩护。他除了主张通过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外，还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谬论。这一谬论的要害，就在于对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根本条件避而不谈，以此来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卖命劳动，否定消灭地主、资本家私有制的必要。当前勃列日涅夫高唱劳动是“获得福利的唯一源泉”，诱使苏联劳动人民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劳动，不过是拉萨尔幽灵在克里姆林宫的再现。拉萨尔在他的《公开复信》中，还根据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杜撰了一个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马尔萨斯胡说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失业和贫困等现象，是因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1、2、3、4、5……）增长。因此，他断言，人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拉萨尔正是依据这一反动谬论，硬说工人所能得到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最低的生活限度上，这个限度是维持生存和生殖所必需的。这是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又不能长久地低于它。

如果实际日工资高于它了，就会引起工人人数增加。工人多了，结果就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水平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如果低于它了，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等现象，造成工人人数的减少。工人少了，这又促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较高的水平。拉萨尔的这个“铁的工资规律”，就是用人口绝对数的变动来解释工资的变动，把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而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结果。按照这种谬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废除了雇佣劳动制度，也废除不了“铁的工资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支配一切社会制度的“自然规律”所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本质，就是要工人永远听天由命，安于贫困，不要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反。这是十足的为资本主义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谰言。

概括起来说，拉萨尔主义就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和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主张通过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帮助”和实施普选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所在。

1864年8月，拉萨尔为了同一个贵族争夺一个女子，在决斗中死去。但其继承者施韦泽、哈赛尔曼等人，仍然顶固地继续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反对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领导的第一国际的革命路线。因此彻底粉碎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就成为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最紧迫的任务。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在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重大胜利——德国 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拉萨尔主义出笼以后，严重地阻碍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六十年代就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创造了条件。

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使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便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壮大力量，发展民主势力争取过革命的道路完成国的统一，进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拉萨尔的公开鼓动以及他所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却变成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导的德国工人运动相对抗的宗派组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敌对的。”^②

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拉萨尔的继承者们拒绝参加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只好越过联合会的首领，直接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和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等人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①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冒牌社会主义的界限，为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奠定思想基础。

早在拉萨尔公开鼓动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言论进行过无情的揭露。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多次指出，拉萨尔在政治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革命的失败，使他更加颓废，居然同一个贵族女人鬼混在一起，过着贵族绅士式的生活，“老是追逐私人情欲和私人事件”。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针对拉萨尔写的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这个历史剧把一个十六世纪德国骑士（即封建主）济金根所领导的反对封建诸侯的起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定了当时在德国爆发的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是直接用来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拉萨尔就是这样利用文学作品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1862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着重批判拉萨尔在《工人纲领》和《公开复信》中所宣扬的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862年7月马克思在伦敦当面严厉批判了拉萨尔的反动谬论。马克思指出：《工人纲领》“这东西不过是《宣言》和我们时常讲的其他东西的拙劣的庸俗化”名为《工人纲领》，实际上却只有一个中心内容，就是硬要工人相信，只有争取普选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522页。

②《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41页。

地位，完全不谈革命，不谈革命暴力，不谈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在《公开复信》中，拉萨尔不仅把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工人党的政治纲领提出来，而且摆出了一付了不起的神气，教训工人说：“要对一切不是普遍直接选举权的事情，或者与它无关的、以及不能通向它的事情置若罔闻！”他象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办法就是要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选到议会中去，并且依靠普鲁士国家的资助，在全国普遍建立生产合作社，于是“社会主义”就到来了。这种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的假社会主义。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大失望。”^①无产阶级应当抛弃这种空中楼阁。马克思、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拉萨尔要建立的“自由国家”就是最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②；他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就是所谓“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③；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

②《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页。

③《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6页。

他们想要实现的普选权，在连资产阶级起码的民主权利都没有的德国，“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①。因此，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帮助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联合会中的左派，从组织上同拉萨尔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作好组织准备。由于拉萨尔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并在实际上同俾斯麦结成了联盟，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1863年就同拉萨尔彻底决裂了。马克思曾经详细地谈到了决裂的原因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旧的党。”^②

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的决裂，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作出了榜样，加速了李卜克内西等人同拉萨尔派在组

①《论拉萨尔工人联合会的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371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页。

织上的决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团结了联合会中的其他先进分子，开始起来反对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路线，特别是在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上，坚决揭露了拉萨尔派支持俾斯麦反动政策的阴谋，并广泛地在工人中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因此，从1864年开始，联合会内部就已经形成了反对派。1867年，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正式退出联合会，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活动。

1869年，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先进工人组织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并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一国际的一个支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感到十分高兴，他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并且不断地帮助它的领导人改正理论上的错误和克服在反拉萨尔主义斗争中的不彻底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爱森纳赫派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日益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恩格斯在总结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服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①。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 和拉萨尔主义的彻底破产

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建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德意志帝国。德国的统一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德国的工人运动也统一起来，以便共同反抗俾斯麦反动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这样，就产生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即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工人政党的问题。

本来，在合并问题上，形势对爱森纳赫派是极为有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森纳赫派由于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声援了巴黎公社革命事业，显示出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就使越来越多的德国工人转到爱森纳赫一边。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却日益丧失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处于内外交困、濒于瓦解的地步，因此，拉萨尔派的首领这时主动要求合并，他们高喊“团结”、“统一”的声音比谁都响。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合并，因为统一德国工人运动是符合革命发展需要的。他们反对的是在合并问题上拿原则作交易、向拉萨尔派投降的机会主义思潮。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一心迷恋一时的成功，要不惜任何代价达到合并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这股向拉萨尔投降的潮流，坚持反潮流的革命原则，明确指出一定要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在彻底抛弃拉萨尔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工人运动，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①。他们谆谆告诫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②。拉萨尔派为了稳固自己摇摇欲坠的阵地，正是这么干的，切莫上当。恩格斯还用第一国际时期反对巴枯宁主义的经验教育德国党的领导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③

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却只看到工人要求统一的呼声，看不到在统一问题上两条不同路线的严重斗争，不懂得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只看到他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反对拉萨尔主义的胜利，看不到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识不破拉萨尔派由拒绝合并而转变为主动要求合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只看到合并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看不到还有高于“统一”、“团结”的原则。因此，李卜克内西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警告，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4年10月同拉萨尔派的代表进行谈判，并参与起草了提供两派合并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纲领草案在两派的机关报上同时发表，后来略加修改，就匆忙于

①《哥达纲领批判》，第6页。

②③《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1875年5月在哥达城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哥达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充满拉萨尔主义反动谬论的纲领草案以后，非常气愤。他们认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①，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②。而哥达纲领草案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③，是使党倒退的纲领。

第一，这个纲领根本“**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④，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一个大倒退。

第二，这个纲领也是对爱森纳赫纲领的一个大倒退。1869年德国党建立时通过的爱森纳赫纲领，虽然从策略意义上保留了一些拉萨尔的口号，但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经济解放的前提，提出要最坚决地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规定党的最终目的是“**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的纲领。在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党的新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⑤。但是，《哥达纲领》却全盘接受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理论和口号，这不是十足的大倒退又是什么呢？

第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爱森纳赫派曾经在整个六十年代同拉萨尔及其信徒作过许多斗争，党正是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诞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诞生后，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

①②③④⑤ 《哥达纲领批判》，第36、6、5、23、36页。

革命路线，使党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而在1875年，却来了一个大倒退，反而向处于孤立地位的拉萨尔派投降。

《哥达纲领》“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接受拉萨尔机会主义纲领，必然要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恶果。

《哥达纲领》的出笼，不仅是德国党的发展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严重的倒退事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理所当然地要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②。

为了迎头痛击拉萨尔机会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并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促使他们彻底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这两条路线的界限，帮助德国党走上正确的道路，首先由恩格斯在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严肃指出：“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③。如果这个纲领草案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④。接着，马克思带病在四月底五月初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逐字逐句进行了批判，并把它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着重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哪些主要谬论呢？

第一，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观点，捍

①②③④ 《哥达纲领批判》，第63、3-4、32、36页。

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拉萨尔派用抽象空洞的“劳动”、“社会”的说教，竭力回避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问题；用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来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否定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用所谓国家资助兴办合作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办法，否定工人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本原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拉萨尔派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所制造的“根据”。马克思揭露道：德国反动的国家机器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①。想依靠这样的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奇谈怪论。马克思尖锐地讽刺说：“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②。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③，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在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加强自己反革命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妄图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帮助”，或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彻底解放。

第二，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自由的人民国家”

①②③ 《哥达纲领批判》，第23、20、24页。

的谬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拉萨尔派用建立“自由国家”的反动主张，歪曲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国家”。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暴力的工具。不仅德意志帝国不可能变成“自由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什么“自由国家”。马克思说：“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①恩格斯也深刻地批判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谬论时，还进一步考察了巴黎公社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总结他全部学说的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可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时，明确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依据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

①②《哥达纲领批判》，第21、22-23页。

③《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199页

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三，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拉萨尔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就在于没有做到“公平分配”。因他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应当领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马克思反驳说，把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可能在消费品分配上做到“不折不扣”，而是“有折有扣”。马克思在精辟地阐明社会产品分配的原理时，科学地论证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在分配和交换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了消除这些旧社会的痕迹，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政治策略上的根本错误和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马克

^①《哥达纲领批判》，第12页。

思指出，拉萨尔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是对《共产党宣言》的恶意歪曲。拉萨尔提出的口号，“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①。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时，进一步论证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思想。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派用“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重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哥达纲领批判》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彻底揭露了拉萨尔主义在理论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反动，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这部伟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它既是反对拉萨尔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这篇文献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坚定的原则性，是马克思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敢于反潮流的光辉纪录。

《哥达纲领批判》对于粉碎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没有接受马克思的批评，并且把这一重要文献扣压下来，不予发表，这就使拉萨尔主义在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彻

^① 《哥达纲领批判》，第16页。

底清算。由于向拉萨尔派妥协的结果，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又滋长起来。当时跳得最凶的，要算是那个江湖骗子杜林了。

杜林（1833—1921）原是柏林大学的讲师，一个混进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狂妄地宣称自己发现了新的“社会主义”体系，全面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方面，杜林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吹嘘自己是发现了“终极真理”的“最伟大的天才”和“第一个超人”，并卖力地鼓吹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杜林竭力兜售唯心主义的暴力贩卖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恶毒歪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

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杜林企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建立一个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未来社会”。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①。这同拉萨尔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②，完全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杜林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还在党内组织了宗派小集团，妄图另组新党，进行阴谋分裂活动。

①《反杜林论》第294页。

②《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6页。

面对着杜林的猖狂进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从1876年5月底开始，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战斗论文。这些文章后来汇总在一起，就是著名的《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这部光辉巨著，不仅彻底粉碎了杜林向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在评论这部著作的伟大意义时指出：《反杜林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认真攻读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继杜林之后，1879年德国党内又冒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就是党内右翼分子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即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愤怒痛斥，并促使德国党的领导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党中央机关报编辑的职务。

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反对杜林主义、“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继续。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斗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理论水平，结束了德国党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进攻和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党在反对俾斯麦的高压政策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巩固和壮大起来。

1880年，党在维登召开了秘密代表大会，从党纲中删去了拉萨尔的“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条，承认“用一切手段”来达到工人解放的目的，并且把拉萨尔派的头目、《哥达纲领》起草人之一的哈赛尔曼开除出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德国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1890年，德国反动统治阶级由高压政策转而采用怀柔政策，废除了镇压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允许工人政党合法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开始泛滥起来，他们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继承了拉萨尔主义的衣钵。为了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流毒，迎头痛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在恩格斯的坚持下，《哥达纲领批判》于1891年第一次正式发表。这一光辉文献在十五年以后公开发表，不仅适应了当时德国党内和整个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标志着拉萨尔主义的彻底破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到了1891年，“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历史充分表明，要彻底战胜一条机会主义路线，需要经过多么长期、反复的较量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公然祭起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开始了。

^① 《哥达纲领批判》，第3页。

四、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就是伯恩施坦派。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臭名昭著的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他出身于德国一个火车司机的家庭。本人在青年时代，曾干过多年的银行职员，并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1872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入党之初，伯恩施坦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所以，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伯恩施坦就主张同拉萨尔派妥协。1875年以后他又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信徒。

1878年，俾斯麦反动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横加迫害。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伯恩施坦吓破了胆，胡说这是德国党“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于是就跑到苏黎世城，在那里他同党内的右翼分子赫希柏格、施拉姆组成了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出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1879年，这三个人联名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宣称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应该服从“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不吓退”资产阶级，就应该放弃自己的革命纲领，把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改良党。他们公然声明：“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对于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谬论，当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愤怒谴责。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等写了一封《通告信》，指出伯恩施坦等人提出的道路，无非是用微小的改良补缀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决不和那些想一笔勾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人们一道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将这些异己分子开除出党。

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迫使伯恩施坦暂时收敛了一下他的机会主义活动，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

^①《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机会主义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伯恩施坦这种虚伪的表态，不过是他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种手法而已。

1881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秘密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这份报纸，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基本上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因此销行很广，颇有影响。伯恩施坦的名声也就逐渐大起来了。特别是在德国党内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革命派反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伯恩施坦虽有过严重的动摇，要辞去主编的职务，但在恩格斯的具体帮助下，他还是勉强留在编辑的岗位上，被迫采纳了恩格斯的建议，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了许多普通党员的来信，斥责了议会党团屈服于俾斯麦的压力、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就更使他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

从此，伯恩施坦竭力标榜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受恩格斯“非常信赖的人”，妄图以此来掩盖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1888年，《社会民主党人报》迁移到伦敦出版。伯恩施坦又一头栽进了费边社（由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4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的怀抱，并力图摆脱恩格斯对他的约束。

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后，伯恩施坦担任了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驻伦敦的记者和中央论刊物《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这时德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胜利，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德国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恐怖政策丧失了信心。1890年帝国议会被迫废除了“非常法令”，转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接着俾斯麦也下台了。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这一转变，使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又活跃起来。首先是福尔马尔跳出来，公然要求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他在1891年大叫大嚷：“对我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满足人民直接的需要和实现最近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最初版本。伯恩施坦这个时候虽然由于恩格斯的监督，没有那么嚣张，但却紧跟在福尔马尔之后，提出所谓“长入社会主义”，“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开始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罪恶活动。

1895年，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之后，伯恩施坦第一个跳了出来，“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①。这就是修正主义的由来。

为什么伯恩施坦要扯起修正主义这一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反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清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便开始替自己另找出路。列宁说：内脏腐烂了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它已经不是自己的独立的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不过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帝国主义时代，机会主义的一个新变种，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机会主义派。从此，修正主义派就成为工人运动内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支别动队。以后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不管他们变换什么手法，喊出什么时髦的口号，实际上都是伯恩施坦的门徒。所以，伯恩施坦就成了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祖师爷。

随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发展，伯恩施坦叛卖马克思主义的而目更加暴露无遗。1900年，他成了党内佑派的公开刊物《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从1900年到1914年，他在这个刊物上变本加厉地鼓吹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从1902年起，伯恩施坦成了帝国议会的议员，更加卖力地为资产阶级政府效劳。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投票赞成帝国政府的军事拨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落为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4月，他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考茨基的“中派”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

从此以后，这两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子就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恶毒地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并一起叛卖了德国的1918年十一月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革命，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1919年，伯恩施坦又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以后，他作为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讲座，继续贩卖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1932年，伯恩施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滚进了坟墓，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伯恩施坦是怎样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写了一系列所谓“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考茨基主编的《时代》杂志上连续发表。1899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本被列宁称作是“叛卖变节的作品”中，伯恩施坦全面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就叫做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跟在资产阶级教授和新康德主义者后面学舌，胡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主张“回到康德那里去”妄图用新康德主义，即更露骨的唯一心主义来取代战斗的唯物主义。康德（1724—1804）是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①伯恩施坦大叫大嚷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

要“回到康德那里去”，实际上是抛弃康德哲学中某些倾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承认“自在之物”（客观事物）可以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等，而把康德哲学中最反动的思想如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完全继承下来，重新拼凑成一个体系。所以，“回到康德那里去”，是修正主义者步新康德主义的后尘，在哲学上提出来的一个倒退，反动的口号。列宁深刻指出，伯恩施坦是在“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①。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②。

伯恩施坦还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硬说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反而不知不觉地受了黑格尔的“概念的自我发展”的支配，诬蔑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妨碍对事物的切合乎逻辑的观察的圈套”。伯恩施坦认为社会只有逐渐的缓慢的进化，没有质变、飞跃，说什么“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这一学说的核心。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伯恩施坦如此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证法，就是企图“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③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①。伯恩施坦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正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借口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某些“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家人数相对地减少，生产的某些发展，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工资的某些增加等等，来否定工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原理，为帝国主义制度涂脂抹粉。

伯恩施坦特别卖力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胡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已使“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下去的趋势”，所以他断言，《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内在矛盾的发展而必然崩溃的理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错误了”。伯恩施坦这套胡说八道，完全是用来掩盖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为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提供“理论”根据。

事实上，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组织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其严重后果就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地发生。在一时的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症。由于经济危机的后果都转嫁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就必然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列宁的结论是：“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无论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或者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说都是如此。”^①伯恩施坦还妄图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他胡说剩余价值论“纯粹是思维的构成物”，是“基于假设的公式”这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无耻诬蔑。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时一个伟大的发现，它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实质，就在于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原因。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才能从雇佣奴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所以，剩余价值论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本质反映，决不是什么“思维的构成物”或主观臆想的“假设”。伯恩施坦妄图否定剩余价值学说，不过是为他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论制造根据。

在政治方面，伯恩施坦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且竭力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辩护。他公然声称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真正民主”的社会，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竭力颂扬资产阶级的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5页。

议会民主。他说，议会制民主“必然会导致消除资本主义的垄断，或导致除去它们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在他看来，议会斗争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最有效手段”。伯恩施坦猖狂叫嚣：暴力革命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是“布朗基主义”，应予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的独裁政治”，不适用于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伯恩施坦主张，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实行“不触动任何人一根头发”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以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严厉地批判说：“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①

伯恩施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然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主张党应当放弃自己的革命纲领，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改良主义的党，一个“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全民”党。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②伯恩施坦取消了无产阶级政党，也就从根

^①《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9页。

^②《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

本上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①，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产物的伯恩施坦主义，还露骨地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政策辩护。他积极赞助德国的殖民政策，说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是完全没有忧惧的必要的”，更不应当对这种政策“深恶痛绝”。伯恩施坦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政策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开发”和“发展”，完全是一副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1897年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伯恩施坦却替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行径辩护说：“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赞成这种做法，而不会丝毫损害自己的原则。”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伯恩施坦上述这一套颇为完整的体系，充分说明他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是，伯恩施坦的这个修正主义“体系”并没有什么“创造”。因为修正主义，“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②就连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我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①②《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整套“理论”，就是老修正主义兜售的破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版。叛徒、卖国贼林彪，除了重弹新老修正主义的老调外，还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把最反动、最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孔孟之道，作为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他的反动纲领。这充分说明林彪的那套“理论”，反动、腐朽到了何等程度！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他有一句臭名远扬的话：“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列宁揭露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

伯恩施坦为了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玩弄了许多卑鄙的手法，喊出了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以便欺骗群众，掩盖自己的叛徒嘴脸。列宁对此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曰：“过时”论。伯恩施坦说，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暴露出许多“缺点和矛盾”，因而显得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陈旧”、“不完备”和“过时”了，要“革新”马克思主义。列宁坚定地说：“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①伯恩施坦诬蔑马克思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不过是他妄图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无耻借口。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尖锐化、扩大化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进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创造了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②。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沿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去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样的革命理论怎么会“陈旧”和“过时”了呢？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更加证明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借口时代的变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正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伯恩施坦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是向无产阶级“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③。这哪里是什么“革新”，这是倒退的理论。

①②③《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203页。

二曰：“批评自由”。这是伯恩施坦提出来的一个时髦的口号。列宁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批评自由”的实质。他说，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伯恩施坦的“批评自由”，就是要求“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①。如果允许了这种“自由”，也就葬送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害怕这种“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

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批评不倒的。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批评自由”，实质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们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不许马克思主义者反击的自由，这是永远办不到的。列宁坚定地表示，伯恩施坦派尽可以“自由地”走向机会主义的泥潭，而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定要“自由地”同一切修正主义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③

三曰：反“教条主义”。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伯恩施坦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教条”，

①③《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227、227页。

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69页。

是“思想僵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成，必须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叫嚣我们不应该把“老师的话永远重三倒四地反复着”。列宁痛斥了这种无耻谰言。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是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伯恩施坦借口“反教条主义”和反对“思想僵化”^①，不过是他们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种眼法，以此来掩盖他们在理论上的无能。由此可见，伯恩施坦反教条主义是假，搞修正主义是真。“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②这就是修正主义者扯起“反教条主义”旗帜的真正目的。

伯恩施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所玩弄的这些卑鄙手法，也被他的徒子徒孙们全部继承下来，成为新老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伎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这么干的，刘少奇、林彪也是这么干的。因此，重温列宁对伯恩施坦所玩弄的手法的揭露和批判，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博得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赞扬。他们弹冠相庆，如获至宝。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纳乌曼在一个杂志上写道：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

①《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72页。

最重要的是，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纳乌曼赞扬伯恩施坦不愧为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最前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效果“将长期被人感觉到”。

纳乌曼这个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确从反面道出了一条规律：这就是无产阶级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切不可忘了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及其修正主义谬论的反动性和消除它的影响的长期性。资产阶级把伯恩施坦当作一个救世主来欢迎，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①所以他们竭力推荐伯恩施坦的著作，连沙皇政府警察局长祖巴托夫也把伯恩施坦的著作当作工人读物推荐给俄国工人。从这些事实中，更加暴露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列宁是怎样粉碎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者的猖狂进攻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笼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正式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派，并逐渐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使德国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第二国际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党，就这样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4卷，第329页。

各国机会主义者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也都附和伯恩施坦主义。例如法国社会党领袖米勒兰，作出了实践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榜样”，1899年他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腓将军一起担任内阁部长的职务。法国党内拥护米勒兰的修正主义者被称为“入阁派”，是伯恩施坦在法国的门徒。其他如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派、取消派，英国的费边派和工联主义者，以及在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的社会党或工人党中，也都出现了一批伯恩施坦的追随者。所有这些人纠合在一起，称兄道弟，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

这一切表明，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国际所属的大多数党都开始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修正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正如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①因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采取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拥护，是坚决同它作斗争，还是同它讲调和，就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问题，成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刚出笼的时候，曾经遭到德国党内以倍倍尔、卢森堡等为首的革命左派的反击。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他们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很不得力。特别是没有下决心同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实行决裂，没有从

^①《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页。

根本上划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界限，这种斗争也是很^①不彻底的。只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敢于反潮流，彻底粉碎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成为反修斗争的伟大旗手。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1899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看到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后，立即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列宁明确指出，伯恩施坦主义就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①

列宁在愤怒抨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时，特别重视对俄国的修正主义，即经济派、孟什维克派、取消派的斗争。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反对建立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孟什维克派直接继承了经济派的衣钵，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支持下，竭力否定列宁的建党学说和革命路线，妄图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孟什维克派又堕落为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列宁深刻地揭露说：“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1903—

^① 《给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

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1908—1914年的取消主义不是别的，正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俄国形式或变种。”^①所以，从1899年开始，列宁连续写了一系列战斗檄文，迎头痛击了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什维克派、取消派的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是列宁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1902年，列宁发表了名著《怎么办？》，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须同经济派划清思想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如果不坚决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而是任其泛滥，那就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②。列宁的结论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指导思想，在思想政治路线问题上，决不能搞调和折衷。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原理。列宁对经济派的批判，沉重地打击了伯恩施坦主义，为在俄国建立一个根本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4年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系统地批判了孟什维克派在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同

①《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

②《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254页。

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体现；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应当有严格的统一的纪律。这就为刚刚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宁在这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著作中，不仅规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者妄图在俄国建立一个涣散的改良主义政党的阴谋。列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和分裂党的宗派集团的存在。列宁所阐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准则，它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修正主义政党的原则区别。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雨中间建立起来的。毛主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这是对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俄国1905年革命风暴中，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集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革命推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列宁在这本书中，坚持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根据这些思想而制定的政治路线，同伯恩

^①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

施坦主义者所宣扬的“议会道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目标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转入了一个以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掌政的反动统治时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吓破了胆，成了革命的叛卖者。为了替这种背叛的可耻行径辩护，他们就把盛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即一种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当作时髦的理论，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他们打着“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的旗号，露骨地鼓吹“唯我论”，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胡说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他们竭力宣扬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否定人的认识有一个辩证的过程，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标准，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宗教”和“神”；他们还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把自己打扮成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派哲学”。伯恩施坦妄图以新康德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则用马赫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新康德主义还是马赫主义，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由此可见，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完全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结成了一体，向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以便为他们的“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1908年，列宁为了从哲学上，即思想路线上，给修正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这本巨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成果，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这个反动哲学体系。俄国的马赫主义者重复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世界是“感觉的组合”的反动观点，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列宁说：“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前提，……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

①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否定实践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自我出发，为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辩护。

列宁在反驳经验批判主义的种种谬论时，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客观世界的规律虽然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但是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标准是实践，“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②客观世界在发人们的实践也在发展，因此，人的认识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不断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决没有什么“终极真理”。如果把人在某一个时期的认识绝对化，就会导致思想僵化和形

①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1、142页。

而上学；如果否定这一时期的正确认识是客观真理，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列宁的结论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①列宁还彻底戳穿了马赫主义者标榜他们的哲学是“无党派哲学”的谎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马赫主义者企图在哲学上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③。事实上，马赫主义者时时刻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这正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中得到了伟大的发展。毛主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讲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④。认真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的《实践论》，对于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①②③《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143、365、347页。

④《实践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30—31页

提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能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样，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伯恩施坦主义泛滥最严重的时候，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等各个方面，给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在斗争中使列宁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这个时期，除了集中精力批判俄国党内的伯恩施坦主义以外，还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同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以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摆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04年8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派造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大会，提出了由列宁亲自参加编写的俄国党内路线斗争的说明材料，明确指出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了俄国党内斗争的真相，一贯支持孟什维克派，要德国党的广大党员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关于俄国党内斗争的“任何一句话”，并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1905年2月和6月，列宁还两次坚决抵制第二国际执行局对俄国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否定了第二国际执行局要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实行“统一”的决定，使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纯洁。

1907年8月，列宁第一次亲自率领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

右派和考茨基的“中派”占了大多数。但是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团结了各国党的为数甚少的左派，在同伯恩施坦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使大会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决定。

这个决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坚决反对本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如果帝国主义战争打起来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要利用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进行革命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列宁坚决驳斥了伯恩施坦等人为帝国主义准备战争进行辩护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在这个大会上，列宁还批判了伯恩施坦等人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认为这是替帝国主义殖民战争进行辩护的极端反动的理论。列宁说：“‘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①社会主义者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主义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②经过尖锐的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比较正确的决定。

这次大会以后，列宁已经深深感到，第二国际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浸透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因此，他告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③，必须严格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

^{①③}《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5、743页。

^②《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3页。

为此，1908年4月，列宁发表了直接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战斗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著名论文中，列宁全面地揭露了伯恩斯坦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罪行，深刻地揭示了修正主义的内容及其反动实质，精辟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反修斗争的伟大意义。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理论上的总结。1910年，列宁再次率领代表团参加第二国际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城召开的代表大会，在反对军国主义等问题上，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12年，鉴于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迫近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战情绪的高涨，第二国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并且通过了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巴塞尔宣言。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的决议，指出即将爆发的战争是侵略性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各国工人利用战争危机发动革命来制止战争，决不要为帝国主义利益而互相厮杀。列宁对巴塞尔宣言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都背叛了这个宣言，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贩子一鼻孔出气。于是，修正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或叫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从而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这也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从1914年以后，打着“中派”旗号的、更为隐蔽的机会主义——考茨基主义，则成了主要危险。列宁在大战期间，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考茨基主义的

斗争，实际上是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和深化。

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列宁深刻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①他还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②反修斗争的这种必要性和长期性，是直接同我们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修正主义。

垄断资产阶级用盘剥和掠夺殖民地而攫取的高额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豢养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是修正主义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工人贵族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党和工会、合作社中，就有一万五千名领高薪的干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成了工人贵族。在英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正是这些人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②《立宪会议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139页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大批小生产者破产，被抛入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这就使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列宁指出，这种情形，也是修正主义能够在工人政党内部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同路人”大批涌入了工人运动内部。例如，在德国就有许多大学生、作家、教授、报纸编辑等纷纷加入党。他们入党以后，很多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并千方百计窃取党的领导职务，成了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修正主义的出现也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资产阶级善于使用力镇压和“神甫”的欺骗这样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中，资产阶级侧重于用一些微小的改良来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中的许多领袖和不坚定分子，就产生了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崇拜。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①

这样，列宁就把修正主义的产生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联系在一起，认为修正主义的产生，“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

^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396页。

社会产物。”^①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反修斗争的长期性。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十九世纪末叶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而向着无产阶级事业完全胜利迈进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广泛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②。但是，不管伯恩斯坦主义也好，稍后的更为精巧的修正主义——考茨基主义也好，他们“既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止不动”^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继续大踏步地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力量阻挡不住的。

①③《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656页。

②《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五、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打着“中派”旗号的考茨基主义，即更隐蔽、更精巧、更虚伪的机会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危险。正如列宁所揭露的：考茨基“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①“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②。

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爆发、名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就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是关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战争期间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所以，从1914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列宁用了很大力量，集中批判考茨基主义，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①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给亚·施酪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152页。

考茨基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 和可鄙地动摇、叛变的典型

卡尔·考茨基（1854—1938），是第二国际一个以“中派”形式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派的首领。他一贯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被第二国际公认为“最著名的理论家”。但是，这个“理论家”的所作所为，却完全证明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考茨基是“头号伪君子 and 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①，是一个“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②。

1871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风暴，把考茨基卷入了社会主义运动，他开始阅读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和拉萨尔的著作。1875年，考茨基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不久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76年考茨基认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并向他们主编的党报投稿。考茨基入党时，他的哲学观点是折衷主义，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同伯恩施坦一样，他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拉萨尔的冒牌社会主义学说。1880年，考茨基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就应一个把社会主义当作时髦调子来唱的大商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赫希伯格的邀请，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同伯恩施坦一起，在赫希伯格主办的出版机构中充当助手。从此，两人臭味相投，结成了“莫逆之交”。

①《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1881年，考茨基来到了伦敦，经倍倍尔的介绍，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81年直到1917年，考茨基长期担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的主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考茨基曾经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如1887年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99年写的《土地问题》等。1889年，他还受恩格斯的委托，开始编辑和准备出版马克思的重要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

因为有了这一段历史，考茨基就自我吹嘘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①考茨基为了使人们不怀疑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再表白自己说：“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和不相信的态度，……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考茨基尽管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背得很熟，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他写的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字不提。对于这样一个自吹自擂、满身沾染着德国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严重脱离革命实践的学究式知识分子，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了他的根本弱点，说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②。这种人，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①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

恩格斯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①

究竟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只要看一下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抱什么态度就清楚了。这个号称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一贯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考茨基大肆鼓吹中庸之道，要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讲“统一”，实际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站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一边。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他说：“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②考茨基为了掩盖自己机会主义的真面目，曾经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刚出笼的时候，连续写了好几部“大作”来反驳伯恩施坦，并因此而“特别出名”。实际上，考茨基批判伯恩施坦，完全是被迫的。他自己就说过：“我起来反对伯恩施坦是极端勉强的，而且常常是被迫的。”他和伯恩施坦早就是臭味相投的两个叛徒，是一根黑藤上结的两个瓜，完全是一路货色。考茨基以自己机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①转引自《恩格斯传》第221页。

^②《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考茨基在他主编的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不加评论地连续发表了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文章的由于广大工人党员和革命左派的强烈抗议，才使考茨基被迫中断了伯恩斯坦其他几篇文章的发表。考茨基自己承认，他所以持这个态度，这是因为他对伯恩斯坦跳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的同感”。

考茨基在德国党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竭力为伯恩斯坦辩护，给他评功摆好。在这次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与伯恩斯坦主义者交锋的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革命左派指责伯恩斯坦的文章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企图使无产阶级对革命的胜利失去信心。考茨基却为伯恩斯坦辩护说，“我的看法不是这样。……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促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

考茨基竭力鼓励伯恩斯坦把他的修正主义谬论写成书，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在考茨基的怂恿和鼓励下，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了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就迫使党在同年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把伯恩斯坦问题列入了大会议程。当时，革命左派坚决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而考茨基却坚决反对，竟然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大家还承认伯恩斯坦是同志，……不要使他痛苦，”在考茨基的包庇下，伯恩斯坦不仅没有被开除出党，而且仍然是党的头面人物。

还是这个考茨基，在第二国际于1900年召开的巴黎代表大会上，竭力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①，即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投降主义作辩护。在左派和右派的激烈斗争中，考茨基第一次打出了“中派”的号，表面上装作不赞成米勒兰的背叛行径，但又反对左派提出的要坚决制裁他的提案，最后由考茨基起草了一个决议，声称米勒兰的入阁“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无需由大会作出决定。这个决议得到了右派的支持而被通过了。列宁愤怒地谴责这个“橡皮性”决议，在实质上是向修正主义者妥协、投降，为修正主义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伯恩施坦抛出了他的“叛卖变节的作品”以后，考茨基又是怎样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论战”的呢？

1899年考茨基发表了第一部“批判”伯恩施坦的著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这部著作却仅仅从经济学方面批评伯恩施坦，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甚至说出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列宁愤怒地指出：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①在1902年和1909年，考茨基还发表了《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等著作。列宁指出，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中大谈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但是，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本原理。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考茨基大喊大叫“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但他仍然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说：“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①。对修正主义采取动摇、调和、折衷和投降主义的立场，必然要使自己堕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这就是考茨基所走过的道路。“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论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的。”^②这就是考茨基“中派”伪善面目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考茨基的“中派”伪善面目和它的修正主义本质，更加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了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成了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考茨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编造了一系列“理论”，诸如“超帝国主义论”啦，“纯粹民主”啦等等，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直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列宁曾经这样揭露过“中派”机会主义实质：“‘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好象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7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

革命。”^①但是，革命是躲避不了的。战争的爆发，加速了革命的到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报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宣告了考茨基主义的破产。

列宁在总结考茨基的一生时指出，考茨基从一个曾经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落为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是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和思想的根源的。考茨基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考茨基主义者不过是工人贵族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②从思想根源，即从“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③看一看考茨基是怎样堕落的，对于我们识破那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叛徒的政治骗子，是大有教益的。

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揭露和批判

帝国主义各国在1914年将人类拖入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战争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

^{①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度正在走向崩溃和没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战争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当时，在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识时代的性质，考察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引起战争的根源，制定出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动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考茨基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抛出了他的“超帝国主义”论，全面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列宁从1914年开始，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这部伟大著作中，列宁考察了《资本论》发表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总结了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规律，创立了帝国主义学说，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和杰出的贡献。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①“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

^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3页。

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正是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其他特征：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越来越占重要地位；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和它们之间为分割世界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空前加剧；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垄断制度必然要带来政治上的全面反动。这一切就使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空前尖锐化。矛盾发展到极点，就势必要引起革命。

所以，列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这一最重要的结论。对于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这些矛盾的发展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最后埋葬帝国主义制度，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精髓。

但是，考茨基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定义。他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麼民族。”他还补充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仅仅是金融资本为了达到兼并落后地区所“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个定义是完全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巧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还要吞并一切国家。因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垄断资产阶

①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737页。

级为了取高额利润，就必然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侵略和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不改变，这种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是断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故意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好象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或那种政策，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关系似的。列宁指出：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①，这不是赤裸裸地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吗？

所以，列宁说，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是直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裁军’、‘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②。

正是从这种反动谬论出发，考茨基捏造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胡说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既然垄断资产阶级会把建立垄断组织（如卡特尔）的政策运用到对外政策上，就会使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彼此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垄断同盟，并在此基础上，以和平和合作来代替彼此之间的战争。于是，帝国主义就进入了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统统都没有了。这样，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持久和平”的新时代。

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1页。

②《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5页。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不久，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反动理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篡改时代的性质，抹煞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尖锐矛盾，以便从根本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首先，“超帝国主义”论力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考茨基胡说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完全可以用“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这样，帝国主义就会停止战争，废除军备，一个“持久和平”的“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就到来了。

列宁痛斥了这种谬论，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不惜采用战争手段“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①。这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掠夺本性决定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统治的加强，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争夺势力范围和领土的斗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空前加剧。它们加紧扩军备战，以便最后用战争手段打败敌手，称霸世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②哪里会有什么“裁军”、“废除军备”的事呢？哪里会有什么帝国主义之间和平共同剥削世界的事呢？当然，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避免失败的厄运，有时也会勾结起来，订立某种协定。但这种协定也不过象列宁

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

②《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所说的，“是一种无聊的骗局”^①，骨子里还是争夺，而且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而它们之间的勾结或达成某些协议，则是相对的、暂时的。

列宁深刻地揭露说，帝国主义各国可能结成的暂时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②。因此，帝国主义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口头上喊“和平”，事实上在准备战争。考茨基在大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还死劲地抹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妄图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本质，以便欺骗无产阶级为了“保卫祖国”，即保卫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去参加帝国主义强盗战争，“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③就考茨基的这种立场，已经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完全一致了。1916年，当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被拖得疲惫不堪，特别是由于害怕人民起来革命，并始谈论“和平”和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的时候，考茨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又拼命地鼓吹社会和平主义，用帝国主义的和平之音来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引诱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相信帝国主义会把和平用盘子端出来。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这两种人，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

①《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9页。

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38页。

③《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①。列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当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充当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辩护士的丑恶面目。

其次，“超帝国主义”论力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考茨基劝说帝国主义者用“和平民主的办法”同殖民地“建立极为频繁的交往、友善的关系”。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做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就消除了；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就会“感谢”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于是，凶残成性的帝国主义就变成了“和平”的帝国主义。考茨基的这一套胡说八道，实际上是给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出谋划策，要帝国主义者采用欺骗性的手段来掠夺殖民地，妄图使帝国主义免受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风暴的冲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人口有十七亿五千万，其中就有十二亿五千万，即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抢占殖民地较少的国家同拥有殖民地较多的国家之间的强盗战争，目的还是要抢占殖民地。这就充分说明，拥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乃是帝国主义生存的生命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殖民地、半殖民地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對抗的、不可调和的。这正是民族解放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据。所以，列宁说，考茨基的“理论”不过是“甜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②，其罪恶目的，就是自己不革命，也

①《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3页。

不准别人革命，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最后，“超帝国主义”论力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已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考茨基却竭力向工人散布幻想，说什么在“超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就会“少受牺牲和痛苦”，无产阶级的福利将与日俱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不会激化。因为“如果事情弄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德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战争期间，考茨基还一再提倡“国内和平”和“阶级合作”，甚至鼓吹无产阶级要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卖命。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已经有着“共同”的利益了。

列宁驳斥说，同考茨基的说教相反，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统治的加强是与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并步而行的。一小撮金融寡头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断加强着生产的社会化，以扩大对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结果使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垄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相反使它更激化了，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发展上。矛盾达到了极点，革命就必然接踵而来。所以，帝国主义时代必然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考茨基散布上述谬论，不过是要无产

阶级“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①。

列宁在批判上述“超帝国主义”论的主要错误时，划清了在如何认识 and 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他指出：“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②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不是暴露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③

由此可见，考茨基如此卖力地兜售“超帝国主义”论，其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要人们不去注意现代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而去注意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从而达到欺骗无产阶级、取消革命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勃列日涅夫之流，完全继承了考茨基的衣钵，在当前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时候，使劲地鼓吹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同美帝国主义者高唱的实现“一代人的和平”完全是一个调子。事实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史的继续，也是帝国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深刻表现。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欧洲为重点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激烈的

①《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②③《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28、812页。

争夺，充分暴露了它们叫嚷的“缓和”、“持久和平”，都是骗人的鬼话，是为了掩盖它们之间的相互争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特别是具有更大欺骗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也越来越被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所识破。他们清楚地看到，苏修叛徒集团的一切言行都是颠倒的：“援助”实际上是掠夺，“支持”为的是控制，嘴上高谈“缓和”，行动上则疯狂扩军，虎视眈眈，肆意侵略、颠覆和肢解别国。表面上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是野蛮的帝国主义。

现在，美苏争霸，从空中到地下，从陆地到洋，遍及全球，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它们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危险就存在一天，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或“一代人的和平”。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

列宁在大战爆发后及时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创立了帝国主义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新原理。这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曾经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大多数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战争的结果，势必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如果在这个薄弱环节上的国家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又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就能首先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并能依靠国内工农联盟的力量，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新原理。他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这个新原理不仅是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他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少数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道路，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光辉前景。列宁正是根据这一新原理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期间制定了革命的方针：“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②这就是说，要动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直接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列宁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阐明了战争和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页。

革命的关系，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光辉思想。毛主席说：“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①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帝俄的力量，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直接引起了十月革命的爆发；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特别是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迅速地制止了帝国主义战争。这就充分表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一国胜利”学说和战争引起革命原理的伟大胜利。在铁的事实面前，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遭到了彻底破产。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问题上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暴露出他们的叛徒嘴脸。考茨基比他的前辈们更系统、更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曾经指出，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考茨基“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记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②

①转引自196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当时，反对考茨基主义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谬论有着紧迫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德、法、英等国，无产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和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俄国，武装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更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这个时期，考茨基更加起劲地美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打着“纯粹民主”的幌子，恶毒攻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妄图配合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意义”“如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①

为了彻底粉碎考茨基主义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反动谬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即1917年的8月，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即1918年的11月，又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光辉著作，给了考茨基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的这些伟大著作，从理论上武装了俄国无产阶级，也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2页。

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条如何夺取政权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

考茨基竭力颂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纯粹的”民主，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根本不同的地方。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用暴力，无产阶级革命则不需要用暴力。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遍平等选举的民主是使阶级斗争从拳头斗争变为头脑斗争的手段”，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通过专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机关枪，……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的”。考茨基的“民主和人道”的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就是和平过渡。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和平过渡”论，阐明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管资产阶级是采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毫无例外地空前加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

部学说的基础。”^①列宁说，幻想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的投票取得稳定的多数就能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嘉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阶级斗争和革命。”^②列宁把考茨基这一套“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谬论斥为“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③。

第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的“和平过渡”论，并不能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的步伐。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也是暴力革命的光辉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对待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抱什么态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同考茨基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是这一斗争的实质。

考茨基极端仇视十月革命，仇视苏维埃政权，加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合唱。考茨基从他的“纯粹民主”出发，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鄙视民主”、“消灭民主”的“专横”。考茨基的这种恶毒攻击，完全证明了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对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当然也就剥夺了这一小撮反动家伙的自由和民主；而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却意味着最广泛的民主。列宁说得好：“苏维埃政权比最

①③《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274页。

②《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①

所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民主”，有的只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②。考茨基竭力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把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是世界文明的末日，当作是民主的末日，只能说期他“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呵！”^③

列宁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标志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从而达到他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考茨基从来不把资产阶级国家蹂躏、镇压本国劳动人民，野蛮侵略和屠杀别国劳动人民的罪行说成是“专横”，而当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所有的喝血的匪帮，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跑出来狂吠什么‘专横’了！”^④这正说明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行独裁非常必要，好得很！如果按照考茨基的办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使“每个人不管属于哪个阶级或者哪个政党，都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那不是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又能是什么呢？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

①②③④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4—635、630、632、660—661页。

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清除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仁义道德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在诬蔑苏维埃政权是“独裁制度”时，也把孔老二这个鼓吹“仁政”的“圣人”搬了出来。他胡说什么以“亚洲式的社会主义”来形容苏维埃政权‘残暴’”，并不“公道”，因为亚洲曾经“诞生了孔子“所以应当称苏堆埃政权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即“暴虐的统治形式”才恰当可见，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对奴隶制度复辟狂的孔老二也是顶礼膜拜的。

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也同样请出孔老二这个亡灵。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疯狂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与中国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超级间谍”林彪遥相呼应，实现他们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狂妄野心。不难看出，新老修正主义者，在攻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时，真是衣钵相传，连语言都是一样的！

考茨基为了丑化无产阶级专政，还恶毒地咒骂革命领袖。考茨基一再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一个“独裁者”、“多疑善妒的神”，诬蔑列宁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的坚决斗争是“排除异己”。考茨基对伟大领袖列宁的可耻诽谤，无损于列宁的一根毫毛，恰恰进一步暴露了考茨基的反革命真面目。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开始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敢于反潮流，敢于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作斗争。从1893年批判俄国马克思主者的凶恶敌人“民粹派”开始，这种斗争从未间断过。这正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品质。

列宁早就讲过：“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①考茨基疯狂攻击革命领袖，实际上也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因为党如果没有极高威信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②。

叛徒考茨基，还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卑鄙手法，千方百计寻找“理论”上的“根据”，妄图从根本上否定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为颠覆苏维埃政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根据”之一，是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过是他在一封信中偶然用到的“一个词”，因此，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考茨基所说的“一个词”，是指《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总结他全部学说所提出的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说，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多年内屡次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歪曲为偶然用到的“一个词”，这本身就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③。

①《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页。

②《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③《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0页。

列宁反复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总结历次革命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一向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试金石。考茨基如此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不过是妄图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理论上的根据，而只是“凑巧记起了”马克思偶然用过的“一个词”。这是多么的荒唐和反动。历史事实恰好证明，马克思的这个“词”——无产阶级专政，却是无比重要，“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根据”之二，是说巴黎公社“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这是考茨基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肆意歪曲公社历史的拙劣表演。列宁指出，巴黎公社决不是“纯粹民主”的产物，而是在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内战中，用暴力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并且运用了武装的人民这个革命权威才维持住自己的统治。而公社的失败正是这个权威运用得不够的缘故。考茨基用歪曲公社历史经验的手法，妄图论证苏维埃政权因为不是“纯粹民主”的产物，因而不能算作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能暴露他对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背叛。

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②《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1440页。

“根据”之三是说俄国太落后，无产阶级只占少数而农民却占大多数，因此，考茨基诬蔑说，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农民专政”。列宁尖锐地指出，这是考茨基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公开“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农民献媚”^①的反动理论。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的特式联盟。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号称“理论家”的考茨基，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竟连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

考茨基这样挖空心思，从“理论”、“历史经验”、“经济分析”三个方面找出“根据”，用来否定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舞笔弄舌，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开了倒车的考茨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②。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还是阶级斗争的结束？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③考茨基就是散布这种谬论的最早的代表。他出于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胡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多数，剥削者只占少数，

①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680、627页。

③《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只要多数决定，少数服从就行了，根本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关系歪曲为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认为剥削者少数会服服帖帖顺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这就从根本上一笔勾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将长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剥削者在多年内还保持着巨大的优势，“**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①这是由剥削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非跳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剥削者尽管是少数，他们“**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的决定**”^②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时，严肃地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③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多么英明！

列宁在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还总结了他领导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阶级斗争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

①②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①这是因为，除了已被推翻但还没有彻底摧毁的剥削者阶级时刻图谋复辟外，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由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存在，由于分配和货币交换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传统、习惯的影响，在工人阶级队伍和国家机关人员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再加上国际帝国主义的捣乱和破坏，所有这一切，就必然使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下去，并且变得空前尖锐和残酷。因此要实现消灭阶级的任务，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是相当复杂而艰巨的。如果不坚持阶级斗争，不坚持和强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列宁警告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

①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防止这种可能性。”^①

今天，认真学习列宁的这些精辟论述，对于批判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揭破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复资本主义的叛徒嘴脸，对于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对考茨基“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考茨基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阻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进，把历史拉向后退，还竭力歪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歪曲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比伯恩斯坦更系统地提出了“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理论。

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一个国家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水平，无产阶级不占居民中的多数，农村的经济分散落后，就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先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社会主义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否则即使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权也是不住脚的。正是从这种反动谬论出发，他否定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坚持只有在工业

^①《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胡说“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集中在资本家手里的财富，才能达到。”而在这之前，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去革命，而是“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根据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考茨基断言，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的多数，根本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公然把十月革命看作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认为革命胜利后，俄国也不能“走向社会主义”。他说：“布尔什维克相信意志与力量万能，他们不考虑俄国的落后状态，要把俄国革命接着社会主义路线进行。”

直到1930年，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他还死抱着“唯生产力论”的破烂武器不放，坚持说“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胡说工业化是“光靠一纸命令和赤卫队”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不过是“野蛮的试验”，“它一定会失败”等等。

总之，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既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否定苏维埃政权能够依自身的力量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不要无产阶级革命论。

列宁对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早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时候，列宁就明确指出：“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

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其错误的”^①。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上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这是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当时的俄国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又有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报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几乎与十月革命同时，在西欧的发达工业国——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却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的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无产阶级政党还不成熟，特别是修正主义者如谢德曼、考茨基之流的叛卖，所以失败了。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能否胜利和巩固关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不在于工业发展的程度。这些历史事实，从根本上宣告了“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列宁强调指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组织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确是无产阶级面临的困难而又艰巨的任务。但是，有了苏维埃政权，有了无产阶级掌握的一切大生产资料，有了牢固的工农联盟，再加上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些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对于工业技术基础和文化水平较落后的俄国，是放弃革命，放弃苏维埃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② 《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

政权，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呢？还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呢？这实际上是革命胜利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列宁在痛斥考茨基的谰言时，明确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①事实也是如此。在列宁斯大林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考茨基幻想苏维埃政权会很快垮台的迷梦破灭了。

综上所述，考茨基更系统地贩卖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就是用来直接对抗列宁的“一国胜利”的学说，指责十月革命是过早的革命，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是要失败的。叛徒考茨基早就把**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末，他是否真的主张西欧发达的工业国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也不是。相反，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疯狂

^①《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691页。

攻击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还大肆鼓吹资本主义“比半个世纪以前其有更大的生命力给朽、垂死的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哪里还主张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是由此可见，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理论”武器而已。所以，尔后的各国机会主义者，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总是要重新扯起考茨基的这面破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林彪，一再挥舞“唯生产力论”的破烂武器，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其“克己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

经过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激烈斗争，这个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和帝国主义奴才的本相。1919年以后，他公开投敌，当了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竭力阻碍德国和苏维埃国家恢复正常关系，并伪造了四大本《德国关于战争爆发的文件》，为德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脱罪责。1927年，考茨基还发表了两大厚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集中了他的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论。1930年，他写了《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煽动帝国主义再次武装干涉苏联，成了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先锋。1938年考茨基死于荷兰，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六、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是混入联共（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也是第三国际（1919—1943）时期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机会主义头子。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实质，是坚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象托洛茨基那样，妄图开历史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了解这一斗争的特点，吸取这一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批林批孔，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托洛茨基的揭露和批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并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

出身于富农家庭，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诞生之日起，托洛茨基就开始了他的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罪恶勾当。因此，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对托洛茨基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明确指出“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以免上当受骗。

1902年，托洛茨基在伦敦同列宁相识，表示拥护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并且参加了一定的工作。但就在这时他也表现了明显的动摇，在鼓吹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的“经济派”和列宁的“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所以列宁把他叫做“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人）。

1903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时，托洛茨基搬弄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否认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地‘夺取政权’，而是已成为民族多数的工人的政治统治”。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托洛茨基拥护马尔托夫提出的关于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定形的、成分复杂的、涣散的党。

在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正式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拥护列宁路线的人，因在选举时获得多数选票而被

①《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506页。

称为布尔什维克或多数派；反对列宁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因获得少数选票而被称为孟什维克或少数。托洛茨基这时追随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而滚入了孟什维克的泥潭。他们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带头抵制列宁领导的党的中央机构，并且发表文章攻击列宁，把列宁坚持原则的斗争诬为“专政者后选人”在党内的争权夺利。列宁尖锐地指出：“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①。1904—1907年间，托洛茨基时而同“经济派”的头子马尔丁诺夫合作，时而以极“左”的面目抛售他的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进行反党活动。托洛茨基的罪恶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俄国1905年革命失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进入了一个斯托雷平（沙皇内阁总理大臣）反动时期。在这种形势下，以唐恩、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为代表的大部分孟什维克，被反革命的凶焰所吓倒，可耻地走上了投降主义道路，主张成立一个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堕落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当时，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取消派的立场。他宣称：“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

列宁愤怒地指出：“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②托洛茨基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宗派团体，创办

^{①②}《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506、502页。

了一个报纸。他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在“调解”党内纠纷和“促进”党内团结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诡计。

托洛茨基恶毒地污蔑列宁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列宁痛斥了这种无耻攻击，深刻地揭露了托洛茨基的所谓“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①。列宁还尖锐地指出，忠诚为取消派效劳的“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②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此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机会主义者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托洛茨基于1912年8月，纠集取消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反党联盟即“八月联盟”。他们百般咒骂一月代表会议，恶毒污蔑列宁是“篡夺者”，是“无聊争吵的能手”，企图“同心协力”地搞垮布尔什维克党。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由于这是一个建立在无原则、虚伪和说空话上面的反党联盟，所以不久就分崩离析，于1914年最终瓦解。

①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5页。

②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1页。

为了总结党内的路线斗争经验，特别是使大家认清托洛茨基这一典型人物的真面目，列宁写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等光辉著作，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列宁指出，托洛茨基“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①，“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②。托洛茨基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③，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的幌子来欺骗年轻一代的工人”^④。这就是列宁在同托洛茨基进行十年斗争后所得出的结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孟什维克取消派变了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托洛茨基则是第二国际中派主义即考茨基主义在俄国的代表。这个所谓中派，是更为狡猾和阴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鼓吹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竭力庇护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并以反战的“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例如，托洛茨基也谈论什么“反对战争和产生战争的条件”的革命斗争，却拼命攻击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这样，他“即使说千万句要以战争反对‘战争和产生战争的条件等等’的最最最革命的话，都是一钱不值的”^⑤。托洛茨基有时也空喊

①②③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506、492、506、486页。

⑤《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4、255页

什么“国际主义”，但实际上却同右派勾结在一起，反对第二国际中坚持国际主义的革命左派。所以列宁把他叫做“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①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好一个托洛茨基!!他总是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②

概括地说来，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虽然经常以“革命”的词句来掩饰其机会主义面目，随风转舵，两面三刀，但只要看看列宁对他的揭露和批判，就不难发现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代办和奴仆。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右实质同孟什维克是一致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更隐蔽、欺骗性更大的孟什维主义。正象斯大林所指出的：“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一直围着孟什维克转，拼命反对列宁的党”^③。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④。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在1917年7月26日—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看到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布尔什维克党又是最受工农群众拥护的，所以他便暂时收起了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旗帜，声明在各个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从而混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利用自己的能说会道，巧于伪装，不久就窃据

①《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4页。

②《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9页。

③《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7页。

④《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

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要职。十月革命胜利后，又先后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外交部长）、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国防部长）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后来的历史证明，托洛茨基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来篡党，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而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托洛茨基就利用自己的职权，在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妄图葬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后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跳出来攻击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列宁、斯大林为粉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激烈的斗争。

十月革命后，列宁亲自领导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在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问题上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日子里，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是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条件。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工农红军还没有正式建立，粮食空前缺乏，经济十分困难；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国际帝国主义则时刻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里。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同德国作战，无异是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拿来孤注一掷。因此，革命胜利后的

第二天，苏维埃俄国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向交战国双方的人民和政府提出了签订公正的和约的建议，但遭到了英、法等国政府的拒绝。于是列宁便决定单同德国进行谈判，并准备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争取立即签订和约。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时间，以便整顿国民经济，建立红军，更好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1917年12月，这一谈判在布勒斯特城开始举行。

但是，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到最顽固的白匪帮。都疯狂地反对签订对德和约。隐蔽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拼命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布哈林公开鼓吹继续战争，托洛茨基则荒谬地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建议，主张“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不签订和约”。他们的机会主义瞎论，反映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甚至连他们的论据，也是俄国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正如列宁指的那样，“这种论据是资产阶级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他们的机会主义谬论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当时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正是希望苏维埃俄国在同德国的战争中遭到毁灭。

列宁同托洛茨基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明确指出必须争取立即签订和约，这正是为了认真备战，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苏维埃政权。然而，担任俄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竟

①《论革命空谈》，《列宁选集》第27卷，第10页。

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破坏谈判。他在1918年2月10日答复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声明，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通知德方：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列宁愤怒地斥责这种叛徒行径是“**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送给德国人**”^①谈判中断后，德军立即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大片领土，威胁彼得格勒。

在这个严重时刻，列宁发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战斗号召，动员了群众，建立了红军，英勇地反击了德军的进攻。同时，列宁又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击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于3月3日和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和约。但是，和约的条件比原来的更加苛刻了，这正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罪过。

（二）在职工会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1921年苏维埃俄国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面临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列宁指出，当时的任务是要在恢复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给工农联盟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要恢复农业就必须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征收农民全部余粮以供应国防需要的政策，代之以新的粮食税政策，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允许私人贸易有一定的自由，扩大商品流转。

在党的政策这个重大转变的关头，不少人思想上是

^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6卷，493页。

混乱的，政治上是动摇的，而托洛茨基则利用这个时机向党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一场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大争论。

其实，职工会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争论也远远越出了这个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党对待职工会，对待群众的态度和方法等政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组织——职工会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振兴工业的工作中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以调动千百万工会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列宁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同工会的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①

但是，托洛茨基却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把“职工会国家化”，反对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在工会中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很明显，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妄想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分裂工人阶级，是妄想“把党和苏维埃政叙拖向后退”，“是开倒车”。列宁坚决地驳斥了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深刻地论证了工会的性质和作用。列宁说，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②工会是党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4页。

②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5、418、403页。

和工人阶级之间联系的桥梁或纽带，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因此，“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①。

在列宁的坚决斗争下，很快地击退了托洛茨基的进攻。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政纲，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妄图迫使党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鉴于托派等派别组织的严重危害性，代表大会还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强调指出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决议严厉申斥了一切反党集团，并责令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规定凡是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这是对托洛茨基一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斯大林为捍卫列宁主义彻底粉碎 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

列宁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对托洛茨基一伙进行了反复的批判和斗争，使托派反党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他们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时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1923年冬，列宁病重不能视事，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托洛茨基认为有机可乘，又出来进行捣乱了。他纠集

^①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一切反党派别，抛出了一个所谓《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和他的一封黑信，向党进行突然袭击。

1924年，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党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恶毒地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破坏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因此，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当时联共（布）和第三国际内部的主要危险。

面对着叛徒托洛茨基的挑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挺身而出，领导党和全国人民，为捍卫列宁主义，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伟大列宁的形象不容歪曲， 伟大的列宁主义不容诋毁

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托洛茨基为了实现篡党夺权、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的目的，首先集中力量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但是，由于列宁和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攻击，而是在打着“颂扬”列宁、“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幌子下，肆意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背地里狠毒咒骂列宁的同时，又伪善地“称颂”列宁是“天才领袖”，是人类精神

力量的“最高峰”。斯大林尖锐地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①

事实正是如此。托洛茨基一伙正是在所谓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幌子下，篡改历史，造谣撒谎，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恶毒地歪曲列宁的形象，攻击列宁主义，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家和两面派的叛徒嘴脸。

托洛茨基在他的所谓论列宁的小册子中，竟阴险地把列宁描述成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卑鄙的污蔑。斯大林说，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深邃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反对轻举妄动的人，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斯大林还在《论列宁》等著作中，深刻而鲜明地刻划出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他说，列宁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一只山鹰，他坚信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创造能力，英勇地引导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前进；在斗争遭到挫折的时候，从不灰心，而是信心百倍地鼓舞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战斗；在处于胜利者的地位的时候，决不骄傲，而是更加冷静地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为巩固胜利和底消灭敌人而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列宁总是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则，决不随波逐流，“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②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②《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托洛茨基及其死党，一方面恶毒攻击列宁，一方面拼命地为托洛茨基树碑立传，刮起了一股股吹捧托洛茨基的黑风。他们捏造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严肃地痛斥了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是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才混进党的，不仅没有参加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而且还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权，事先把起义的日期向敌人泄密，妄图阻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武装起义，当即遭到列宁的谴责，这怎么能谈得上是什么“唯一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当然，“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①。

托洛茨基分子还捏造说：托洛茨基“很会打仗”，是国内战争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组织者”。这更是颠倒黑白的弥天大谎。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②。事实是，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多次违反列宁的指令，给革命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例如1919年夏在东方战线与白军决战时，托洛茨基在白匪高尔察克受到严重打击即将覆灭的前夕，却荒谬地命令停止追击，并且要平分兵力，把一部分红军从东方战线调到南方战线去，妄图给敌人以喘息时机，让他们重整旗鼓，疯狂反扑。

①②《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291页。

正是列宁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及时否决了托洛茨基的错误主张，下令对高尔察克乘胜进攻，并在托洛茨基不再干预东方战线事务的情况下，才解放了乌拉尔全境，粉碎了高尔察克匪帮。在南方战线和其他的战线，也无一不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排除了托洛茨基的干扰，才取得了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托派的这一套手法不断地被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所袭用。苏修叛徒集团甚至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仅是一般政工人员的赫鲁晓夫，说成是“红军的缔造者”，这也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吧！在中国，林彪反党集团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袭用托洛茨基的卑鄙伎俩的行家。他们把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悲观动摇、贪生怕死的林彪，扮作一贯“高举”的“英雄”，把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畏敌如虎的林彪，次成“首先发动”和“直接指挥”这两大战役的“常胜将军”，把这个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不学无术的大军阀，捧为“天才军事家”、“非凡的统帅”。顶顶的桂冠，雨点似地落在林彪的头上，真是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二字！“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①。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机会主义头子，之所以使用着同样的造谣撒谎、篡改历史的手法，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党夺权、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狂妄野心。

①《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

托洛茨基恶毒诋毁列宁的伟大形象，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①他在1924年出版的《新方针》这本小册子中，以“解释”列宁主义为名，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定义。“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这真是用漂亮的空话来歪曲列宁主义、把列宁主义庸俗化的典型。后来，托派的另一个头目季诺维也夫也歪曲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把列宁主义说成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只适用于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从而否定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针对托洛茨基一伙以及二国际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②同时他还精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伟大的国际意义，揭示了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阐明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基本原理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

①《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

②《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二）批判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 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1925年，苏联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的水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快告终结。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919—1920年），进入了一个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1924—1928）。

斯大林分析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情况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就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而技术上经济上又很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实质是“谁战胜谁”。是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屈服于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复辟？

1925年4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末这种

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会议还通过决议，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

但是，托洛茨基却把他在1905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乔装打扮一番，重新抛了出来，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妄图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学说的否定。

众所周知，1850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理论。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①。他教导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革命之后，要不停顿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列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后来，列宁还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理，并且阐明了一国革命胜利同世界革命的关系，要求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应当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从世界革命的高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不断革命的任务。这就充分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彻底革命精神。

^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然而，托洛茨基却采取了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卑鄙伎俩，用偷梁换柱、以假乱真的手法，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篡改，炮制了一个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石。他在俄国1905年民主革命高潮中，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质的区别，竭力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诬蔑农民不过是“落后的一帮”，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抛开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表面看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毫不间断，比革命还“革命”，而实际上却是既取消了民主革命，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巩固沙皇的反动统治。

在十月革命前夜，托洛茨基又打着“国际革命”的招牌，断言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接连不断地爆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他声称：“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也是一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重新抛出的“不断革命论”，又是些什么货色呢？第一、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第二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物质基础，胡说什么“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在民族国家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他认为这种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胡说什么“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帮助，

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斯大林迎头痛击了这种无耻谰言。他指出，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本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①

斯大林还深刻地揭露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就是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否定无产阶级有领导和团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能力；就是蓄意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对立起来，把国际无产阶级多种形式的援助歪曲为只能有一种直接的国家援助，把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淆起来，散布消极等待和悲观失望的思想，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斯大林强调说，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谬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么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就一个也不要革如果那个国家万一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也只能“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这哪里是什么不断革命，而是十足的“‘不断’绝望的思想”^①是不折不扣的复辟倒退的反动谬论。虽然托洛茨基善于“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②，但是，“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③托洛茨基这一套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愿望的集中反映。

托洛茨基一伙不仅在国内进行猖狂活动，而且还把他们的反党活动扩大到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中去，竭力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胡说什么中国只有反帝的任务，没有反封建的任务，拼命反对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还扯起“唯生产力论”的破旗，荒谬地预言：“落后的中国”没有可能“在自己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在他们的支持和扶植下，1927年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同陈独秀等叛徒相勾结，于1929年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宣扬托洛茨基主义，散布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谬论。中国的托陈取消派还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1931年“九·一八”

①《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319、327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页。

③《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3页。

事变后，他们按照托洛茨基“不阻碍日本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走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当时几名托洛茨基分子所乱唤乱叫的所谓“理论”，本质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的“**不要革命论**”^①。托派在中国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完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是为投降卖国制造反革命舆论河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与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分不开的。

毛主席正是在同党内“左”、看倾机会主义以及同托派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为我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才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主席又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同修正主义的激烈搏斗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它将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但是，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却把

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6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诬蔑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狂犬吠日，无损于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而恰恰暴露了林彪一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死敌。

（三）粉碎托季反党联盟的猖狂进攻，为捍卫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和党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的团结而斗争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为在苏联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1925年12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要把苏联由农业国变为能够自力更生地生产必需装备品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在这次大会上，出现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的所谓“新反对派”。

1926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又和这个“新反对派”结成托季反党联盟。他们猖狂地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反对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大搞分裂破坏活动，妄想篡党夺权，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为了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托洛茨基一伙抛出了“世界分工”论和所谓“超工业化”政策。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世界分工，苏联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可能自力更生制造出重要的机器，苏联经济正在“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不难看出，这一套“世界分工”论，还是

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重弹。斯大林痛斥托洛茨基象“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①，并且尖锐地指出，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投降主义谬论来发展工业化，就会把苏联经济“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体系的附属品”^②。

托洛茨基分子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们骨子里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在形式上有的时候又用“左”的词句鼓吹“超工业化”。当“世界分工”论被驳倒以后，他们又打着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幌子，胡说什么现在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必须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才能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用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的办法“发展”工业的所谓“超工业化”政策，完全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其结果必然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批判了这种反动主张，坚决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到1927年，社会主义大工业已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绝对优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托季联盟在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②《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页。

大搞分裂破坏活动。他们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叫嚣党内制度是“独裁”、“不民主”，声称必须彻底“整刷”党的机关，更换党的领导，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取消党的铁的纪律，允许派别活动的自由。他们还特别恶毒地攻击斯大林，用最卑鄙最污秽的语言，污蔑斯大林是“苏联的独裁者”、“专制君王”等等。斯大林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之流的攻击和诽谤，指出他们反官僚主义是假，反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真；他们要求党内民主是假，结成反党集团，分裂党、瓦解党是真。他们这样疯狂攻击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比其他同志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一切诈骗勾当，是因为斯大林和他们作了最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党的革命路线，这是斯大林的光荣。

恩格斯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托季反党联盟就是一伙相互勾结、寡廉鲜耻的两面派，狼狈为奸、耍弄阴谋诡计的行家。他们明里是人，暗里是鬼；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表面上高喊团结统一，实际上却在秘密组织第二党，私建印刷所，并在其党羽中征收党费，散布政纲。当着他们感到形势对自己有利时，就一哄而上，挑起公开争论，气势汹汹，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当他们处于不利境地时，就一面倖善地要求休战，鼓吹“党内和平”，一面咬牙切齿，窥测方向，准备和实行新的进攻。

①《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6页。

1927年8月8日托、季等发表声明，表示要“尽量消除一切派别活动因素”，与此同时，却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的政纲”。他们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要求举行全党争论。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迎击了这场挑战，于同年10—11月，进行了全党的大辩论。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联共（布）中央还把托、季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经过全党认真地、民主地辩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名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不到百分之一，托季联盟眼看着自己遭到的可耻惨败，就决定孤注一掷。11月7日，他们纠合了一小群人，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结果被声势浩大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队伍撵走了。这样，托季联盟就公开地滚进了反革命的营垒，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

1927年11月14日，党中央决议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的其他首领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一并开除出党。至此，托季联盟被粉碎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帜下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托洛茨基被清除出党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于1929年被逐出苏联。1929—1940年，托洛茨基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等地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起来，更加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

他纠集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派分子，于1938年9月在巴黎拼凑了一个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第四国际”（又叫“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以破坏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他又在1932—1933年，指使他的儿子谢多夫，串通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苏联秘密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害团总部”和“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并在一些城市组织了暗杀团。这些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任务，就是按照托洛茨基和德、日法西斯特务机关的指令，有计划地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刺探国防机密情报，破坏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组织反革命叛乱，配合帝国主义者进攻和瓜分苏联，妄图里应外合，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就是这样地公然叛党叛国，彻底地堕落为一伙十恶不赦的暗杀者、破坏者、侦察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

1940年托洛茨基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叛徒卖国贼的必然下场。林彪反党集团效法托洛茨基一伙，组织反革命别动队，阴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妄图复辟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其结果也是折戟沉沙自取灭亡，大好的祖国河山没有他的葬身之地，同样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七、列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布哈林，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妄想依靠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当时仍有很大力量的富农，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从1928年开始，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又立即转入了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其人

布哈林（1888—1938）是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和托洛茨基一样，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倒车、搞复辟的机会主义头子。

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数学教师的家庭，早年就学于莫斯科大学，1906年钻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他同列宁认识，1913—1914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曾协助列宁出版《真理报》。1917年，布哈林混入党

的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长期窃据《真理报》主编的职务。

早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面目就有所暴露，遭到列宁严厉的批判。

1915年2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瑞士的伯尔尼举行的国外各支部代表会议上，布哈林抛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纲，即所谓《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立起来，攻击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列宁把它斥之为“荒谬绝伦；无耻之极；半无政府主义”的提纲。

1916年，布哈林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家理论的文章。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的。他鼓吹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一切国家，“取消”和“炸毁”一切国家，从而得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列宁在《青年国际》一文中，对布哈林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指出布哈林是要托无政府主义观点强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是要用机会主义路线冒充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反对列宁为党定的通过武装起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声称帝国主义资产者已经同农民结成了联盟，农民不会跟着无产阶级走。他认为第一阶段应当实行的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土地后就心满意足了。第二阶段是在西欧支持下的、没有农民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

① 《给亚·施略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

列宁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出席，斯大林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论，指出布哈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缺乏阶级分析。富裕农民虽然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但贫苦农民是会跟着工人阶级走的。因此，布哈林的“儿戏般的方案”是错误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加紧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罪恶活动。1918年布哈林纠集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活动。他们同托洛茨基相勾结，公开反对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布哈林在“左”的词句的掩饰下，制造“德国人不会进攻”的谣言，鼓吹“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争”，甚至气势汹汹地给坚持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者扣上“和帝国主义勾结”、“德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帽子，强迫党接受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愤怒地斥责他们是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是要断送苏维埃政权。

列宁反复地向党内同志说明必须立即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工农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是否签订布勒斯特和约这个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极其尖锐，列宁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列宁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的说服教育，终于使党内多数同志理解并接受了列宁的主张，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击败了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路线。

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1页。

和约签订后，布哈林一伙仍不甘心失败，又把持党的莫斯科省委，通过决议，以分裂来威胁列宁领导的党中央，公然鼓吹“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对于这种奇谈怪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没有出路，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才会写出这种怪诞的决议。”^①当时党还不知道布哈林的全部反党阴谋。后来查明，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曾伙同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妄图在破坏布勒斯特和约的同时，逮捕并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推翻苏维埃政府，由他们取而代之。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列宁坚决地打击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破坏活动，果断地签订了布勒斯特和约，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坚持革命原则和实行必要的妥协的光辉范例。列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地阐明了革命的妥协和机会主义妥协的原则区别。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②

①《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第442页。

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4页。

1918年11月初，德国无产阶级起来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在13日郑重地宣布废止掠夺性的布勒斯特和约。列宁的具有远见的策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对于正确区别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同苏修和美帝的勾结、妥协，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1920—1921年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又纠集起一个所谓“缓冲”集团，掩护托洛茨基派别活动分子，帮助他们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布哈林披着“公正”的外衣，胡说什么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和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但都偏重了一个方面。列宁严厉地批驳了这种折衷主义谬论，深刻地论证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还无情地戳穿了布哈林的“公正”外衣，痛斥布哈林的所谓“缓冲”，实际上是火上加油，应当叫做“缓冲煤油”。因为他所说的都是反对列宁的话，而没有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这就充分证明，布哈林集团的真正作用，“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①。

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428页。

1921—1923年，布哈林一伙竭力反对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经济政策。他们拜倒在资本主义的脚下，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无原则的让步，把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等等。列宁谴责说，布哈林是资本家、投机商人和富农的拥护者。

针对布哈林长期搞编辑工作，号称“理论权威”，喜欢以理论家的姿态为机会主义路线辩护的特点，列宁在逝世前夕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持别提醒全党：

“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因为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①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这个“理论家”所作的评定。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一切政治骗子一样，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这就延缓了他们暴露的过程，也增加了识别的压难。1927年前，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面目虽已暴露，但还未彻底暴露。事实证明，布哈林是托洛茨基的门徒，并且早已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典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然而，在联共（布）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托季反党联盟的斗争中，他有时却装扮成积极的拥护者，甚至还说了一些托、季的坏话，因而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捞了不少资本，钻得更深，爬得更高。1923年以后，他窃据了党中央政

^①转引自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2页。

治局委员的要职，1926年，又攫取了共产国际主席的头衔。但是，布哈林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永远隐蔽他的真相，他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1928年，他就提出了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最嚣张的态度向党进攻，直至堕落为公开的叛徒、卖国贼终于身败名裂，自取灭亡。

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路线反对 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联共（布）反对托季联盟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27年末，工业生产达到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42%。但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同工业的迅速发展很不适应，特别是粮食生产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同时，富农又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和国家的缺粮困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制造混乱，拼命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1927年12月2日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同时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关系到人数最多的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革命的转折关头，最能暴露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深入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布哈林再也按捺不住对党对人民的刻骨仇恨，便破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和党进行较量。他同1928年窃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一起，纠集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集中攻击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布、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出现，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同布、李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农村阵地后一次极其重大的路线斗争。

（一）是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阶级的路线，还是保护富农的路线？

联共（布）同布、李反党集团的斗争首先是在富农问题上展开的。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十月革命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15%，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富农每年生产的粮食约占俄国粮食总产量的38%，每年提供的商品粮约占商品粮总数的50%。

十月革命以后，富农分子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曾勾结国内外

反动势力，到处组织反革命暴动，多次制造粮食危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到1927年，由于连续二年的丰收，富农的经济力量明显地增长起来。于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他们拒绝把囤积的粮食卖给国家，暗杀集体农民和农村中党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放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仓等等。

为了打退富农的猖狂进攻，1928年春，联共（布）采取了打击富农的非常措施。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并没收其余粮，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四分之一长期贷给贫农。同时，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贫农和中农投入反对富农的斗争，很快地改善了粮食收购情况。

党对富农的斗争遭到布哈林一伙的疯狂反抗。他们公开鼓吹“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无耻叫嚷对富农经济的进攻“加重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提高粮价，使市场“常态化”，即贸易自由化。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迎头痛击了这种保护富农的反动主张。斯大林指出，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打击富农的势力，必须坚决实行限制富农进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特别尖锐地

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①斯大林还批判了所谓市场“常态化”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的用意就是要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放弃价格政策，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其结果不仅国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而且会使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更加猖獗地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大发横财，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为了保护富农，还拚命反对党在农村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阶级政策，竭力混淆农村的阶级阵线。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布哈林宣称：富农“不过是穷人罢了”，中农“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斯大林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明确指出：农民决不是清一色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我们的政策是阶级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②。布哈林的谬论不过是“阶级合作”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1929年年底，联共（布）中央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进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剥削的

①《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

②《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页。

政策。布、李反党集团保护富农的路线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二）是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还是保持小农经济，回到资本主义去？

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布哈林一伙从保护富农、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出发，必然要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合作社的计划，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谬论，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斯大林指出，农业集体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富农剥削，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根本道路，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根本道路。

针对那种认为小农能吃苦耐劳、小农经济优于大经济的小农经济“稳固论”，斯大林说，小农经济力量单薄，不能采用新技术，不能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当农民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会不断地分化出富农和资本家来。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它时刻受到破产的威胁。因此，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①。斯大林还论证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要比小农经济优越得多，不仅机

^①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页。

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这样，就是依靠农民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也是这样。“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①

斯大林还特别强调：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即同时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没有立足之点，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失败，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此，“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由于历史的发展其共同的客观规律，所以有时“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事实正是这样。”^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刘少奇一伙也是从资产阶级、富农的立场出发，把布哈林之流的破剑烂戟当作向党进攻的新武器。他们一方面拼命鼓吹发展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胡说什么“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要大力发展“二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疯

①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7页。

②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219页。

③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9页。

狂叫嚷：“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好”。另一方面又被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吓破了胆，利用他们窃取的职权，大搞“反冒进”，大砍合作社。甚至在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五年以后，他们还公然叫苦“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刘少奇这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比起他的祖师爷布哈林，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光辉著作中，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和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精辟地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合作化的方针、具体道路和方法步骤等重大问题。针对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毛主席还强调指出：“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毛主席的一系列英明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工农联盟的伟大理论。

（三）是坚持阶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布哈林为了给保护富农、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源，采取了一切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抛出了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同

^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199页。

早在1922年，布哈林在他所作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资产阶级、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无耻地宣称：“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认为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长入的问题”。“修正主义者……断言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开始了。而我们认定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哪里有什么所谓分歧，不过说明布哈林比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更加反动罢了。以后布哈林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进一步兜售这些反动谬论，公开提出不必经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富农都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深刻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反动谬论。他说、城乡资本家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客观依据。“从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①因此，“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

^①《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

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①

事实上，布哈林一面高喊应当熄灭阶级斗争，一面又猖狂地向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发动进攻，这种言行本身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斯大林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敌对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不反对他们，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

从政治上、思想上粉碎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929年夏，广大农村进入全盘集体化的时期，社会主义在农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豪迈地把1929年称为“**大转变的一年**”^②在这种新形势下斯大林提出了防止敌人利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反对革命的严重问题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集体农庄虽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还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反革命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和苏维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③

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7页。

②《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6页。

③《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4页。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正是利用社会主义形式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他们正是挂着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招牌，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他们正是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形式，对内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侵略扩张、推行霸权主义的。他们就是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血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四）是资本主义危机必不可免， 还是资本主义“稳固”论？

在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向富农进攻的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到1928年，资本主义世界从1924年开始的暂时局部的稳定已经动摇，又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怎样看待这种形势，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着还是在巩固着，——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加深，相对稳定局而动摇，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增长的时期。因此各国共产党应当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但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

①《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页。

集团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却猖狂地反对这个正确方针。布哈林利用他当时窃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不经联共（布）代表团的审查，擅自抛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他在这个提纲中，同第二国际余孽社会民主党一唱一和，重弹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老调，（早在1919年，布哈林就鼓吹“随着经济矛盾的消失不见，……分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声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内部矛盾日益缓和，目前没有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胡说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持久的、巩固的。这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稳固论”，实质上是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国际范围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掩盖帝国主义日趋尖锐的矛盾，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斯大林在驳斥这种反动谬论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性质，分析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证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必不可免。斯大林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上的所谓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这是一种在腐烂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腐朽的稳定。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的所谓“繁荣”景象中，一方面是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一方面是劳动群众的更加贫困化，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所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产生着最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

展的辩证法”^①。

针对布哈林的提纲，斯大林还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②历史事实充分地证明了斯大林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就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一直延续到1933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失业人数达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这次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爆发的，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破坏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宣告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局面的结束，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以及布哈林之流的无耻谰言。

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武装各国共产党人，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欺骗和影响，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及其后果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③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② 《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4页。

是当时美英之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都空前尖锐化，从而加速战争和革命的到来。

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正而着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个时候，重新学习斯大林对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光辉论断，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有助于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研究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政治危机的关系，警惕美苏两霸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大胜利。

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覆灭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布哈林及其死党，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在强大的无产阶级

①《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2—223页。

专政条件下，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就更加依靠耍两面派手法，施展阴谋诡计。

从1928年7月到11月，布哈林曾经两次伪善地声明，他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分歧。但事实上就在这年7月，布哈林等人却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密谋同托派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改变党的路线。7月以后，布哈林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等黑文，肆意攻击党的政策。与此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又以辞职来要挟中央。

1929年初，他们的反党活动变本加厉起来，公然重弹托、季联盟的老调，诬蔑联共（布）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等等，并且装着“受屈”的样子，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攻击”。

联共（布）中央及时地揭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1929年1月和4月，中央局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卑鄙的反党伎俩，并强调指出党同布哈林集团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掩饰和歪曲都是办不到的。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耍两面派手法，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联共（布）中央1929年11月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机会主义分子，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党派别活动。

但是，布哈林一伙并没有丝毫改变其反动立场，反而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1932年，他们纠集各种反革命分子组成了右派与托洛茨基分子联盟，

接着又同托派一起，按照德、日法西斯特务机关的指令，进行了谋害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破坏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大规模的暗杀、破坏活动，堕落为叛徒、卖国贼。

为了掩护他们的阴谋，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还伪装悔改，发表了悔过的演说，戴上“忠于党”的假面具，用最动听的语言来“颂扬”党，调子唱得比谁都高。事实证明，这些叛徒高唱“颂歌”之日，也正是他们向党狠下毒手之时。1938年12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他们指使的凶手暗杀了。就是这些刽子手，还居然写了悼念和颂抚基洛夫的“祭文”，并要求公开刊载出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切倒行逆施的人，都决没有好下场。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等被判处死刑。布哈林一伙妄图暗害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叛党叛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破产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遭到了覆灭。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注意了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和总结了斯大林在实际上解决了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的经验，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党夺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照耀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灯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靠保证。

* *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这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不仅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因此，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着重大的意义。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

^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打着什么旗号，变换什么手法，都是要竭力歪曲、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彻底揭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是如此，现代峰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是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林彪也是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一百多年来，国际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得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①。马克思的这个预言一定会实现。苏修叛徒集团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般逆流，它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更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①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